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22卷第2期（總第44期）　2025年 12月　頁75~126

【研究論著】General Article　　DOI:10.6163/TJEAS.202512_22(2).0003

傳說被建構成「歷史」：以汶萊的「中國公主」與「Ong Sum Ping」傳說為例

Legends were Constructed as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Brunei's "Chinese Princess" and "Ong Sum Ping" Legends

郭宗華*
Chong-Wah KOH

關鍵詞：汶萊、汶萊王室世系書、中國公主、黃森屏、王總兵
Keywords: Brunei, Silsilah Raja-raja Brunei, Chinese Princess, Ong Sum Ping

2024 年 1 月 8 日收稿，2024 年 11 月 5 日修訂完成，2025 年 3 月 17 日通過刊登。

* 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中文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Malaysia.

摘要

在汶萊早期歷史敘述中，有「蘇丹娶中國國王親戚」的說法，最初見於一份一五九〇年的西班牙手稿。此外，在十八至二十世紀初的數份《汶萊王室世系書》中，也有「蘇丹娶中國國王親戚」和「Ong Sum Ping 娶蘇丹之女並繼位為蘇丹」的傳說。自一八八〇年英國學者羅歐有關《世系書》的文章問世，開始有學者關注汶萊蘇丹譜系裡的中國血統傳承，而最早提及 Ong Sum Ping 的中國學者溫雄飛將其譯為「黃森屏」，認為真有其人。然而，中國史書並無相關記載，過往學者也只能憑藉有限史料進行合理推測，是否真有其人其事，至今仍無定論。儘管如此，當代一些汶萊學者與官方依然認定上述兩人是「中國皇帝的親戚」，稱該女為「公主」。在民間，Ong Sum Ping 的身世傳聞眾多，真偽莫辨，更有黃氏後人硬把「黃森屏」納入其家族譜系中。文章暫且擱置是否真有其人、傳說抑或史實等問題，關注於傳說故事的產生、流傳、演變過程，並探討各個時代不同背景與立場的故事講述者的敘述動機，以及其在近當代被建構為「歷史」的現象。

Abstract

In the early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Brunei, there is a saying that “the Sultan married a relative of the king of China,” which was first seen in a 1590 Spanish manuscript. In addition, in several versions of “Silsilah Raja-raja Brunei” from the 18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ies, there are also legends of “The Sultan married a relatives of the Chinese King” and “Ong Sum Ping married the daughter of the Sultan and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ritish scholar Hugh Low’s article on “Silsilah Raja-raja Brunei” in 1880, scholar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ancestry in the Brunei Sultan's lineage. Wen Xiongfei, the Chinese scholar who first mentioned Ong Sum Ping, translated it as “Huang Senping” and believed that he really existed. However, there is no relevant record in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scholars in the past can only make reasonable speculations based on limi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whether there is really such a thing is still inconclusive. Nevertheless, some contemporary Brunei scholars and officials still believe that the above two persons are “relatives of the Chinese emperor” and regard the Chinese woman married by the Sultan as “princess”. Among the people, there are many rumours about the origin of Ong Sum Ping, and it is difficult to verify the information. There are also descendants of the Huang family who insisted on including “Huang Senping” in their family pedigree. This article puts asid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re is a real person in history, whether it is a legend or historical fact, etc.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fabrication, spread, and evolution of legendary stories, and examines them with Chinese historical data to find out their “historical prototypes”. In addition, it explores the narrative motivations of storytell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positions in different eras, and the phenomenon that they have been constructed as “historical”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壹、前言

在早期汶萊蘇丹王朝的歷史敘述中，有「蘇丹娶中國國王親戚」以及「Ong Sum Ping 娶蘇丹女兒並繼位為蘇丹」的說法。現存最早的相關文獻，是一份成書於一五九〇年的西班牙文手稿，裡面提到了汶萊第一任蘇丹前往中國並娶了一位「中國國王的親戚」（a relative of the king of China）為妻的故事。另一方面，在十八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成書的數個版本的《汶萊王室世系書》裡，也有提及汶萊第一任或第二任蘇丹娶了來自巴當岸（Batangan）的「中國國王的親戚」（saudara raja China）；十九世紀中後期至二十世紀初的一些版本則在蘇丹譜系中加上了一個名叫 Ong Sum Ping 的中國大臣的傳說，稱他來到汶萊娶了蘇丹的女兒，成為第二任蘇丹。此外，汶萊民間流傳的詩歌與口頭傳統甚至把這位 Ong Sum Ping 說成是中國皇帝的兒子。

自一八八〇年英國學者羅歐有關《汶萊王室世系書》的文章問世以來，一些西方學者開始對早期汶萊蘇丹世系裡的中國血統傳承與 Ong Sum Ping 的來歷產生興趣，認為該「巴當岸中國國王」便是 Ong Sum Ping，娶了第一任蘇丹的女兒，其妹妹或女兒又嫁給了第二任蘇丹。二十世紀上半葉起，Ong Sum Ping 的名字出現於一些「華僑史」著作中，自中國學者溫雄飛將 Ong Sum Ping 中譯為「黃森屏」，往後大部分中國與華人學者便沿用此譯名，但也有「黃總兵」、「黃昇平」、「黃升平」、「王三品」、「王總兵」等說法。二十世紀九〇年代起，一些汶萊當地學者也對傳說中嫁給蘇丹的「中國國王親戚」之女與娶了蘇丹女兒的 Ong Sum Ping 產生興趣，稱該女是「公主」，認為 Ong Sum Ping 娶了蘇丹女兒後被封為親王，而汶萊歷史研究中心與官方更是將上述兩人認定為「中國皇帝的親戚」。另一方面，有關 Ong Sum Ping 的來歷和故事仍為人們津津樂道，也有一些黃氏後人為「黃森屏」編造了完整的「個人資料」，以便能把這位傳說中曾在海外稱王的「祖先」納入其家族譜系之中。

汶萊「中國公主」與 Ong Sum Ping 是否真有其人？他們是不是「中國國王的親戚」？雖然當地史料的確記載了一位「中國國王的親戚」之女嫁給蘇丹以及中國大臣 Ong Sum Ping 的一些事蹟。然而這便如同傳說中嫁到

馬六甲的中國公主漢麗寶[1]，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流傳的一些中國公主故事[2]那樣，中國明代史書根本沒有提及有公主嫁到馬六甲，甚至歷朝歷代史書都不曾有過任何一個「中國公主」嫁至東南亞任何一個政權的記錄。[3]因此，學者一般都對當地史料文獻的說法多有保留，並以「中國史書無載」為由，認為這些所謂的「中國公主」都不是真正的中國公主，但不能完全排除歷史上或有中國或華人女子曾嫁給當地君王的可能性。[4]至於汶萊版的中國公主與 Ong Sum Ping 的真實性問題，與上述情況大致相同，中國史書文獻根本隻字未提過該公主與 Ong Sum Ping，儘管過去一百多年來一些中、外與當地學者曾對此有過關注，但在缺乏可靠史料的情況下，也僅能憑藉有限的資料進行比較合理的猜測與聯想，致使上述問題至今仍無明確的答案。

義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曾經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即所有「歷史的書寫」，永遠無法脫離歷史撰寫者的主觀立場與當代的思維。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我認為，一部史料文獻至少可以進行兩種層面的解讀，第一層面是史書文獻中所敘述的內容或故事本身；第二層面則是史書文獻的來源出處、作者的身份背景、主觀立場、創作動

[1] 漢麗寶公主（Puteri Cina Hang Li Po）的故事出自馬來歷史文學著作《馬來紀年》（*Sejarah Melayu*）中，故事敘述中國國王為與滿剌加王國蘇丹滿速沙（Sultan Mansur Shah）交往，便將女兒嫁給了他。現存的《馬來紀年》手抄本共有三十三份，分別藏於英國、荷蘭、俄羅斯、印尼、馬來西亞等地的圖書館。目前主要刊印且流通的版本有《萊佛士 18 號》本（*Raffles MS. 18*）、《萊敦》（John Leyden）本、《門希》（Abdullah Munshi）本、《希勒別》（William Shellabear）本、《阿末》（Abdul Samad Ahmad）本等等。一六一二年成書的《萊佛士十八號》本該中國公主名叫「Hang Liu」，十八世紀下半葉成書的《萊敦》本該公主名叫「Hong Li-po」，《門希》本、《希勒別》本皆作「Hang Li Po」。因《門希》本、《希勒別》本皆以馬來語出版且流傳較廣，故該中國公主以「Hang Li Po」之名廣泛流傳於當地，一般被中譯為「漢麗寶」。

[2] 我所搜集到的資料裡，東南亞一帶至少有十個有關「中國公主嫁給當地君王」的故事，分別有菲律賓的「蘇祿島版」；泰國的「素可泰王朝版」；緬甸的「貢榜王朝版」；馬來西亞的「吉打王朝版」、「滿剌加蘇丹王朝版」；印尼的「巴厘島版」、「亞齊蘇丹王朝版」、「滿者伯夷王朝版」、「井裡汶蘇丹王朝版」以及本文的研究重點「文萊蘇丹王朝版」。

[3] 郭宗華：《東南亞的「中國公主」傳說研究》（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2 年），頁 8。

[4] 郭宗華：《「傳說」如何被建構為「歷史」——以「中國公主漢麗寶」的故事為例》（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頁 57-63。

機，以及文獻成書與流傳過程的歷史背景。換句話說，我們不應該只是表面地關注該部史書文獻中敘述了些什麼內容，而是更要深入地探討該書作者或該故事為什麼要這樣敘述？這樣寫的意圖是什麼？該故事是要表達些什麼意義？這樣才能比較完整地解讀一部史料或一則故事。因此，即便真實性有待商榷的史料文獻，或是純屬虛構的傳說故事，它的創作或產生的背後，也或多或少反映著當時的歷史背景、作者的創作目的和講述者的敘述動機。

另一方面，即便只是傳說或故事，其中可能也包含了一定的歷史成分。正如中國民俗學研究者鍾敬文所認為的：「傳說並不是真實的歷史事實，它和歷史上記載的事件是有區別的。但是，從另一種意義上說，任何傳說都是有一定的歷史意義的，因為它的產生都是有一定的歷史現實作為依據的，就是說脫離不了歷史的條件，帶有一定的歷史性」。[5]可見，傳說與歷史雖有本質性的區別，但傳說的產生與流傳或許跟真實歷史有著密切的相互關係。傳說裡的大部分故事情節也許是虛構的，但其中的某些細節或元素可能是來自某件發生過的歷史事實，有它的「歷史原型」。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便是民國史家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6]。

綜上所述，儘管一些學者以「中國史書無載」為由加以駁斥這些東南亞一帶所謂的「公主和親」都是子虛烏有的，但當地的民眾乃至學者仍更加願意相信這是真實的，並且往往可以拿出一些當地史書文獻為其佐證。另一方面，就算是不可靠的史書文獻，或是虛構的傳說故事，作者或敘述者編造與講述該故事的立場動機和故事產生、流傳的歷史背景也是真實

[5] 鍾敬文：《民間文藝談藪》（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195-196。

[6] 孟姜女傳說的原型是春秋時期的真人真事，最初記載於《左傳》。齊侯攻打莒國，先鋒杞梁戰死。齊侯班師回國，在郊外遇見杞梁之妻，就想在郊外向她弔唁。杞梁之妻以「郊外不是吊喪之地」為由加以拒絕，齊侯聽了她的話，便到她家裡吊唁杞梁。本來這是一個講述杞梁之妻懂得謹守禮法的故事，戰國時《檀弓》、《孟子》等書中增加了杞梁妻善哭的情節；漢代《說苑》、《烈女傳》裡增加了杞梁妻哭到城牆崩塌的情節；南北朝時「齊將杞梁戰死，其妻哭倒城牆」與另一個故事「秦時死於築城的范郎」合流，出現了杞梁被迫修築秦長城，死後屍體被築在長城裡邊的情節；到唐代，「杞梁之妻哭倒秦長城」的情節框架基本確定下來，此後這個故事便一直是為了批判「秦始皇的暴政」而存在，流傳至今；一直到宋代，杞梁之妻的名字才被改成了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孟姜女」。

的。因此，本文暫且拋開汶萊的「中國公主」和「Ong Sum Ping」是否真有其人、是否中國國王親戚、傳說還是史實等問題，轉而關注該傳說的產生、流傳與演變，不求能完整追溯上述兩人的真實身份和歷史淵源，但至少能大致梳理早期汶萊歷史中有關「中國傳說」的流傳、演變的歷史過程，探討各個時代不同背景與立場的故事講述者的敘述動機，以及它被賦予了哪些存在價值與意義，務求為這個傳說被建構為「歷史」的現象提供一些較合理的說法與解釋。

貳、一五九〇年西班牙手稿「汶萊蘇丹娶中國公主」的故事

著名東南亞史家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在其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東南亞的貿易時代 1450-1680》（*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中敘述早期汶萊[7]與明朝中國的關係時，有一句話這麼說；「汶萊的傳說中就有一位君主前去中國並與中國公主（Chinese Princess）結婚的故事（Dasmarinas, 1590: 4）。」[8]這句話引起了我的興趣。我便「順藤摸瓜」，尋找與「Dasmarinas」和「一五九〇年」相關的資料，果然有所發現。

這則汶萊版「中國公主」的傳說來自一份一五九〇年成書的西班牙文手稿[9]（以下簡稱《一五九〇年手稿》），該手稿相信是與一五九〇年駐馬

[7] 古代汶萊在中國史料裡的名字有「婆利」、「渤泥」、「勃泥」、「淳泥」、「婆羅」等。本文在不修改文獻的原則下，中國文獻一律沿用其原來的稱呼；英文文獻中的「Borneo」視其敘述情況使用「汶萊王國」或「婆羅洲」，「Brunei」使用「汶萊」；馬來文文獻中的「Berunai」、「Brunei」也統一使用「汶萊」。此外，為了方便讀者理解，本文盡量以「汶萊」稱呼近當代汶萊，以「早期汶萊」或「汶萊王國」稱呼近當代以前的汶萊蘇丹王國，以「古代汶萊」稱呼汶萊蘇丹王國建立之前存在過的汶萊政權。

[8] 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著，孫來臣、李塔娜、吳小安譯：《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頁 288。

[9] 這份西班牙文手稿最初是由葡萄牙籍教授博瑟爾（C. R. Boxer）於一九四七年在倫敦購得。該手稿記錄了早期汶萊的地理、歷史、法律、宗教、政府、禮儀、商業、武器和歷法。除了汶萊，手稿裡也敘述了日本、中國、法摩沙（今臺灣）、呂宋、班乃、宿務、棉蘭老島、蘇祿、新幾內亞、爪哇、蘇門答臘、馬來半島和其他地方。博瑟爾於一九五○年曾發文介紹該份手稿，並於一九五三年翻譯發表其中有關中國的部分。奎里諾斯和

尼拉的西班牙總督達斯馬里納斯（Gomes Perez Dasmarinas）有關聯，也許該手稿是出自其秘書庫爾拉（John De Cuellar）的手筆，信息提供者或許是一些居住在呂宋島，曾經去過汶萊王國的他加祿穆斯林（Muslim Tagalog）[10]。一九八二年，一位研究汶萊歷史的學者卡洛爾（John S. Carroll）曾將其中有關汶萊的部分英譯出來，發表於《皇家亞洲馬來亞分會學報》。

我將該文章有關「中國公主」的部分中譯出來，是這樣說的：

> 〔……〕上述王國（汶萊王國，Borneo）裡有另一種人被稱為伊斯蘭（Yslanes，即「Islams」），也就是說，不吃豬肉的那些人，我們也叫他汶萊人（Borneyes）。 這些人保留《可蘭經》，他們是外來人，他們的來源如下面所敘述的。正如他們所說的那樣，這開始於三百年前，或多或少，來自面向麥加的馬來亞語的省份，有一個來自考因（Cauin[11]）城的城主。這個城主的名字叫蘇丹尤索夫（Sultan Yuso，阿拉

加西亞（Carlos Quirinos and Mauro Garcia）於一九五八年翻譯發表其中菲律賓的部分。卡羅爾（John S. Carroll）翻譯其中的第七十一至八十二頁有關早期汶萊的部分，於一九八二年發表了 *Berunai In The Boxer* 一文。本文的故事便是轉譯自卡羅爾一九八二年的英文翻譯。

[10] 這份手稿中並沒有註明作者是誰，手稿敘事至一五九○年，因此博瑟認為這份手稿是由一五九○年至一五九三年駐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達斯馬里納斯，或是其兒子小達斯馬里納斯（Luis Perez Dasmarinas）所作。奎里諾斯和加西亞認為這份手稿的字跡與一位原士兵轉當達斯馬里納斯秘書的庫爾拉相似。卡羅爾則認為這份手稿也與一五七八年時率領西班牙軍隊進攻汶萊王國的駐馬尼拉總督桑德（Francisco De Sande）有關聯，但西班牙士兵不可能得知那麼多汶萊王國的詳細情況，信息提供者必定是曾經住過汶萊的人，而手稿中也有許多他加祿語（Tagalogs）和馬來語的特色，因此，信息人或許是居住在馬尼拉，曾經去過汶萊王國，講馬來語的他加祿商人。一五七八年進攻汶萊王國前，為了取得相關情報，桑德曾審問了一些來自呂宋島並曾經去過汶萊的他加祿穆斯林，而達斯馬里納斯在一五九○年擔任總督時，也會想要得到有關貿易、潛在敵人與西班牙盟友的當前訊息，或許博瑟爾教授所購得的手抄本，便是一部由其秘書庫爾拉將此前（一五七八年）和當時（一五九○年）的資料整合而成的筆記。參見 John S. Carroll, “Berunai In The Boxer Codex,”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55, No. 2 (243) (1982), p. 1。

[11] 卡羅爾指出蘇丹尤索夫移民婆羅洲前統治的「Cauin 城」難以斷定在何處，應該在印尼群島某處，或許是新加坡與蘇門答臘之間的昆杜爾島（Pulau Kundur，廖內群島之一）的薩旺村（Sawang）。

伯語「Yusuf」），根據他們的說法，他是考因城的王，他和其臣民離開了自己的土地和王國，用許多船隻載來大量的人，發現了許多土地，自稱永遠是主人或王，並稱他帶來的全部人是奴隸。跟隨他的航程，他到達婆羅洲，與當地的維薩亞人（Uisayas[12]）打了幾次戰爭，因此他們佔領了該地，並取得了成功（對維薩亞人）。他佔據了一塊土地，花了一些日子安頓下來，依靠那裡的果實，並且找到了樟腦（camphor）。除了這個王國之外，現在還不知道其他地方有盛產（樟腦），這樣東西是他們和其他國家非常重視的。還有在南部邊界的三巴斯（Sambas）上方有礦山和金礦，和一些珍珠漁業（蘇祿）。他不滿足於此，作為一個年輕人，他希望得到更多，決定繼續前進，尋求更多土地，再次與他的所有人一起出海。他轉向東北航行，一些時日後，到達中國土地上的港口，並請求許可上岸。他登陸並前往求見中國的國王，那位他認為更為優越的國王。那位中國國王確認了他作為王的稱號，並賜予他象徵王室的徽章，時至今日該汶萊國王仍然保有[13]，並且，看那位蘇丹尤索夫還是個單身漢，他讓一個中國女人（Chinese woman, Sangleya[14]）嫁給

[12] 該手稿中「Uisayas」就是維薩亞人（宿務語稱「Bisaya」，英語稱「Visayans」），屬於南島人的一支，是現今菲律賓人口最多的民族，主要分佈於菲律賓中部的米沙鄢群島（Visayas Island），婆羅洲也有為數不少的維薩亞人。

[13] 關於一五九○年手稿裡提到的中國國王送給蘇丹尤索夫的信物，《明實錄》與《明史》裡載永樂皇帝封渾泥國麻那惹加那乃為國王，賜印誥、敕書、勘合等；《東西洋考》（1617 年）稱「王有金印一枚，重十六兩，印上篆文作獸形一隻，云是永樂間所賜者。夷人婚娶，請印印背上」。羅歐的文章中提到早期汶萊王國擁有來自柔佛的王冠（crown）和來自中國的「kamanah」作為傳承王位的信物（Low, 1880: 17），穗尼文章中的 B 手稿也稱早期汶萊王室擁有來自柔佛的王冠（mahkota）和來自中國的「kemahib」作為傳承王位的信物（Sweeney, 1968: 58），但不知道「kamanah」或「kemahib」指的是什麼樣的信物。我認為該中國信物應該便是《明實錄》、《明史》裡提到的「印誥」和《東西洋考》裡提到的「金印」。不過，汶萊王國早期所有的王室信物包括來自中國的印誥（金印）在一六六一年至一六七四年的宮廷內戰中被弒君篡位的蘇丹哈庫·慕賓（Sultan Hakkul Mubin）用大炮轟入海中而丟失了。

[14] 卡羅爾說該手稿裡用的原文「Sangleya」，他將之翻譯為「Chinese Woman」。維克伯格（Edgar Wickberg, 1965: 9）推測「Sangley」一詞來源於中文的「商旅」（Shang Lü,

了他。因此，他仍能統治上述王國（汶萊），是因為她是中國國王的一位親戚（a relative of the king of China）[15]。上述中國女人是一個在中國境內名叫南太（Namtay[16]）的城主，和蘇丹尤索夫成了親。他告別了中國國王，帶著他的妻子和人民，回到了婆羅洲，離開了他妻子負責收取租金和房產的南太城〔……〕

那位蘇丹尤索夫回到婆羅洲，他與他帶來的奴隸和臣屬在那邊安頓下來。他讓原住民服從於他，讓他們納貢。他與上述中國妻子擁有孩子。他活到很老才去世，他去世時，留下一塊金子做的牌子。根據他們說的，這大概可以推測，他在上面留下了指示，他們在上面刻寫下從他開始繼承王位的人的名字。所以，他們在這塊金牌上刻寫下自己（國王）的名字並保留起來。這塊金牌在桑德總督時丟失了，這位總督從這些（菲律賓）島嶼過來，洗劫了汶萊王國[17]。據了解，那位年老的王，就是擁有這（金牌）的人的父親，將它掩埋起來或是丟進海裡去；那位國王在那時死去，他沒有留下任何關於那個金牌的資訊。

---

merchant and traveller）；雷塔那（W. E. Retana, 1896: 34）解釋「Sangleyes」一詞意思是按慣例來來去去的，每一年都要來去這些島嶼（菲律賓）做生意的人；博瑟爾（C. R. Boxer, 1953: 260）註明這份手稿裡「Sangley」可用兩個中文字來表示，即「常來」（constantly coming）。參見 John S. Caroll, “Berunai In The Boxer Codex,” p. 22（注17）。

[15] 我認為這句話便是那些他加祿商人敘述此故事的主要目的，想要向西班牙官員表明身為外來者的汶萊蘇丹之所以能夠統治婆羅洲，原因在於他們的祖先曾經得到中國國王的冊封並與中國國王的親戚成婚，蘇丹的子孫擁有中國王室的血統。英文原文為「Accordingly it appears that the reason he persevered in the said kingdom[of Borneo] was that she was a relative of the king of China」。

[16] 卡羅爾認為「Namtay 城」可能指的是中國福建省漳州市的「南太武」。

[17] 駐菲律賓的西班牙總督桑德曾於一五七八年從馬尼拉率軍攻打汶萊王國，汶萊王國被佔領七十多天，蘇丹塞夫·里札（Sultan Saiful Rizal，1533-1581）之子薩甘親王（Pengiran Bendahara Sakam）率軍民反攻，才將西班牙人趕走，汶萊史稱此戰役為「卡斯提拉戰爭」（Perang Kastila）。

> 曾經當過汶萊國王的人已不清楚了，除非是那些有留下信息的才能讓人記得，這些人有：現在統治的國王的曾祖父名叫蘇丹蘇萊曼（Sultan Soliman，阿拉伯文「Sulaiman」），他的祖父叫蘇丹薩蘭（Sultan Salan），他的父親也就是丟失金牌的名叫蘇丹阿裡爾・魯拉（Sultan Aril Lula），他的兒子也就是我所說的現在的國王名叫蘇丹努拉・阿蘭（Sultan Nula Alan），他的兒子現在被指定為他的繼承人的名叫拉惹・汶萊（Raja Borney）。那些統治汶萊的國王都是通過合法繼承的，沒有間斷過且都是最年長的兒子繼承，因此，他們是直接來源於上述的蘇丹尤索夫和中國女子，他的妻子[18]。[19]

參、《汶萊王室世系書》中有關中國人的傳說

有趣的是，當地現存各種版本的《汶萊王室世系書》（*Silsilah Raja-raja Berunai*[20]）裡，也提及了早期汶萊蘇丹迎娶中國國王親戚為妻的事

---

[18] 這句話也能看出那些他加祿商人講述這個故事的動機，即向西班牙殖民官員表明汶萊蘇丹統治該國的理由和合法地位，因為汶萊蘇丹是被中國國王冊封過的蘇丹尤索夫及該中國國王親戚的直系後代。

[19] John S. Caroll, “Berunai In The Boxer Codex,”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55, No. 2 (243) (1982), p. 5.

[20] 現存的《汶萊王室世系書》至少有六個版本。最早的版本是一七三五年蘇丹阿拉烏丁（Sultan Alauddin, 1730-1737）在位期間由雅庫布（Datuk Imam Yaʿakub）開始撰寫，再由拉蒂夫（Haji Abdulʿ Latif）於一八〇七年續寫完成的，此版本成為日後大部分手稿的參考藍本。該版本的一份抄本目前收藏於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 Studies, London），一九六八年由穗尼（P. L. Amin Sweeney）將其轉譯為現代馬來文並發文出版，穗尼稱其為《A 手稿》。第二個版本是拉蒂夫在蘇丹莫哈末・塔祖丁（Sultan Muhammad Tajuddin, 1795-1807 年）的命令下於一八〇四年篆刻的墓園石碑（Batu Tarsilah）版本，內容與 A 手稿大致相同，本文稱其為《石碑版》。該石碑內容最早由羅歐發表於其一八八〇年出版的文章 *Selesilah (Book of the Decent) of the raja Bruni*，為該文的第五部分；一九七四年沙里夫丁（P. M. Shariffuddin）和拉蒂夫（Abd. Latif Hj. Ibrahim）根據該石碑內容再度發表 *Batu Tarsilah: The Genealogical Tablet of the Sultans Brunei* 一文，並糾正了羅歐的一些錯誤。第三個版本是寫於蘇丹塞夫丁二世（Sultan Omar Ali Saifuddin II, 1828-1852）時代的版本，但不知道作者是誰。這份文獻的

情。最早翻譯並出版《世系書》的是英國殖民官員兼學者羅歐（Sir Hugh Low），將其得到的一些手稿和資料翻譯成英文，於一八八〇年發表文章，不過他在文中並無詳細交代其文章各個部分所使用的資料來源和手稿成書年代[21]。鑒於此，我便摘錄另外兩份由英國學者穗尼（P. L. Amin Sweeney）於一九六八年轉譯成現代馬來文，成書過程與年代相對清楚的《世系書》（即《A 手稿》和《B 手稿》[22]）的相關內容。

原始手稿已不知去向，現在能看到的是羅歐一八八○年文章的第一部分將其譯成英文的版本，本文稱其為《羅歐版本》。第四個版本是在一八○七年雅庫布和拉蒂夫版本的基礎上，一八四一年由阿米努丁（Imam Aminuddin）開始撰寫，再由阿都·慕明（Abdul Mumin）於一九三六年修訂完成的手稿。該版本的手稿目前收藏於倫敦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London），同樣由穗尼於一九六八年將其轉譯出版，穗尼稱其為《B 手稿》。第五個版本是一九三八年卡瑪魯丁親王（Pengiran Sabtu Kamaluddin）撰寫的版本，該手稿將第三任蘇丹沙里夫·阿里（Sultan Sharif Ali）視為汶萊最初的蘇丹，本文稱其為《卡瑪魯丁版本》。此外，英國圖書館東南亞部門主任安娜貝爾（Annabel Teh Gallop）於二○一九年發表文章，又介紹了一份藏於吉隆坡國家博物館的手稿，她推測這份手稿是一八八○年羅歐撰文時從可素瑪親王（Pengiran Kesuma）那裡拿到的其中一份手稿，約成書於一八三一年，本文稱之為《可素瑪手稿》。

[21] 羅歐於一八八○年發表的文章，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二部分是他翻譯成英文的其中一份《世系書》（*Selesilah(Book of the Decent) of the raja Bruni*）手稿及該譯文後面的「筆記」（*Notes*）；第三部分是「汶萊蘇丹與其後裔的歷史」（*History of The Sultan Bruni and of their Decent, from Sultan Abdul Kahar to Sultan Abdul Jalil-ul-Jebar*）；第四部分是他根據手上資料整理出來的「汶萊穆罕默德君主清單」（*List of Mahomedan Sovereigns of Bruni, or Brunei Proper*）；第五部分則是「石碑的抄錄和翻譯」（*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a Historic Tablet*）。除了石碑翻譯的開頭有詳細敘述篆刻年代和作者介紹，羅歐在文中並沒有詳細說明前四個部分所根據的資料以及其手稿的來源及年代，只在文章中的幾個註釋裡提到一位名叫可素瑪親王（Pengiran Kesuma）的人，羅歐的資料應該都是由他提供的。參見 Hugh Low, "Selesilah (Book of the Decent) of the raja Bruni", *Journal of the strait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 5(June 1880), pp. 1-35。

[22] 第一份《世系書》手稿收藏於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圖書館裡，編號為 *MS. No. 25032*，由英國著名馬來亞史家溫斯泰德（Sir Richard O. Winstedt）捐贈，穗尼稱其為《A 手稿》（*MS. A*）。另一份《世系書》手稿收藏於倫敦皇家亞洲學會圖書館，編號為 *MS. No. 123*，同樣由溫斯泰德捐贈，穗尼稱其為《B 手稿》（*MS. B*）。參見 P. L. Amin Sweeney： "Silsilah Raja-raja Berunai，"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1, No. 2 (214) (1968), pp. 1-2。

Plate 2. The First Part of the Genealogical Tablet.

Plate 3. The second part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Tablet.

【圖一】石碑版《汶萊王室世系書》[23]

《A 手稿》（起草於一七三五年，最終成書於一八〇七年[24]）敘述：

〔……〕第一個將伊斯蘭教帶來汶萊並遵循穆罕默德先知（Nabi Muhammad）的伊斯蘭教法的君主，是蘇丹莫哈末[25]（Sultan Muhammad）和他的兄弟蘇丹阿末（Sultan Ahmad）。[26]與其從中國巴當岸（China Batangan）娶來的中國國王親戚（saudara raja China）的妻子擁有一個女兒。那位公主嫁給了來自塔伊夫國（Negeri Taʾif[27]）的沙里夫・阿

[23] 圖來源：截圖自 P. M. Shariffuddin, Abd. Latif Hj. Ibrahim. "ʿBatu Tarsilah': The Genealogical Tablet of the Sultans of Brunei,"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7, No. 1 (225) (1974), p. 89.

[24] 穗尼認為 A 手稿中的《世系書》是一七三五年蘇丹阿拉烏丁在位期間由雅庫布開始撰寫，拉蒂夫於一八〇七年續寫完成。參見 P. L. Amin Sweeney: "Silsilah Raja-raja Berunai," p. 2。

[25] 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名叫「Muhammad」，汶萊第一任蘇丹也名叫「Muhammad」，為了不造成混淆，我以「莫哈末」的譯名來稱呼第一任汶萊蘇丹。

[26] A 手稿中並沒有明確註明到底是蘇丹莫哈末還是其弟弟蘇丹阿末娶了那位來自中國巴當岸的中國國王的親戚。當代汶萊史學者一般都認為是蘇丹阿末娶了該女。

[27] 塔伊夫（Taʾif）位於今沙烏地阿拉伯麥加省的一個城市。

> 里（Sharifʿ Ali），所以沙里夫・阿里成為君主，封號為帕杜卡・斯里・蘇丹博卡（Paduka Seri Sultan Berkat）。他強化了伊斯蘭教法，建造回教堂，並動員所有中國人民建造石頭城（kota batu[28]）〔……〕那位蘇丹博卡生下的兒子是蘇丹蘇萊曼（Sultan Sulaiman）。蘇丹蘇萊曼的兒子是蘇丹卜基亞（Sultan Bulkia），即那位打敗了蘇祿國和瑟魯容國（negeri Seludong[29]）的君王，該君王原名達都・甘辦（Datu Gamban）。接下來蘇丹卜基亞的兒子是蘇丹阿都・卡哈爾（Sultan ʿAbdul Kahar），原名為瑪亨・克拉默（Marhum Keramat）。瑪亨・克拉默的兒子是蘇丹塞夫・里札爾（Sultan Saiful Rijal）。蘇丹塞夫・里札爾的兒子是蘇丹沙・汶萊（Sultan Shah Berunai）〔……〕[30]

《B 手稿》（最初修訂於一八四一年，最終成書於一九三六年[31]）則說：

> 〔……〕汶萊國的第一個君王名叫阿旺・加臘・貝塔塔（Awang Khalak Betatar[32]），封號為蘇丹莫哈末，也是第一個引入伊斯蘭教並根據穆罕默德先知的伊斯蘭教法的君王。這位國王殿下與其從巴當岸（Batangan）娶來的中國國王親戚（saudara raja China）的妻子擁有一個後代〔……〕[33]

---

[28] 石頭城（Kota Batu）位於今汶萊首都斯里巴加灣東部汶萊河沿岸地區，據說是在蘇丹沙里夫·阿里在位時號召當地華人所建，曾是早期汶萊蘇丹王國的都城。

[29] 瑟魯容（Seludong 或 Selurong）是馬來王朝時期稱呼馬尼拉的歷史名稱。

[30] P. L. Amin Sweeney, “Silsilah Raja-raja Berunai,”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 41, No. 2 (214) (1968) , pp. 11-12.

[31] 穗尼認為 B 手稿中的《世系書》是在雅庫布和拉蒂夫版本原有的基礎上，於一八四一年在蘇丹塞夫丁二世的允許之下由阿米努丁抄錄下來，最後於一九三六年由阿都·慕明抄錄並修訂完成。參見 P. L. Amin Sweeney, “Silsilah Raja-raja Berunai,” p. 3。

[32] 穗尼《B 手稿》裡的蘇丹莫哈末原名叫「Awang Khalak Bertatar」，羅歐的文章裡稱其為「Awang Alak Ber Tabar」，當代汶萊史家多稱其為「Awang Alak Betatar」。

[33] 此段落之後的內容敘述汶萊王國原本為爪哇滿者伯夷的屬國，但在滿者伯夷國勢衰落後，

〔……〕[34]他（蘇丹莫哈末）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女兒。

在此之前，中國國王（raja China）命令兩位大臣來到汶萊，想取得中國巴魯（China Balu[35]）山頂上的龍珠（kemala naga）。其中一位年老的大臣名叫黃蓬剛（Ong Bong Kong[36]），另一位大臣名叫黃森屏（Ong Sum Ping[37]）。兩位大臣帶來的許多中國人都被巨龍吃掉，還是取不到牠的龍珠。因此，那座山被命名為「中國巴魯」山，因為有很多中國人死在那裡。那兩位中國大臣絞盡腦汁，究竟要如何取得那顆龍珠。最後才由黃森屏想到了辦法。那個辦法就是製作一個像油燈一樣的玻璃盒子，在玻璃盒子裡放了一支大蠟燭，再製作一紙風箏。那個時候，守護龍珠的巨龍外出尋找食物，黃森屏跳上風箏同時帶著玻璃盒子。來到山頂上，黃森屏把點著蠟燭而足夠明亮的玻璃盒子放下，把龍珠拿走，然後再跳上風箏，由他的屬下拉回風箏的繩子，直到黃森屏

汶萊王國不再進貢。與本文無太大關聯，因此省略。

34 此段落敘述阿旺·加臘·貝塔塔應柔佛蘇丹的邀約前往柔佛（Johor），柔佛蘇丹冊封其為汶萊國蘇丹莫哈末，賜予他大鼓、大鐘，以及五塊領土。除了最後一句敘述「蘇丹莫哈末沒有兒子，只有女兒」之外，其餘內容與本文無太大關聯，因此省略。不過，歷史上的柔佛王國應該創建於一五三六年，並不是阿旺·加臘·貝塔塔生活的十四世紀，因此，早期的西方學者如羅歐認為《世系書》裡的「柔佛」指的是「滿剌加王國」(Melaka)，但大多數當代汶萊學者則認為是指「新加坡拉/淡馬錫」（Singapura/Temasek）。

35 即如今的京那巴魯山（Gunung Kinabalu）。

36 在羅歐一八八○年文章第一部分英譯的《世系書》（羅歐版）裡，該名與 Ong Sum Ping 一同前往汶萊的大臣名叫「Wang Kong」。溫雄飛（1929 年）將 Ong Sum Ping 中譯為「黃森屏」，將 Wang Kong 中譯為「黃剛」；李長傅（1937 年）將 Ong Sum Ping 中譯為「黃昇平」，將 Wang Kong 中譯為「王剛」；陳育崧（1983 年）則認為 Ong Sum Ping 或為「王三保」三字之訛偽，「Wang Kang」其實是馬來語「帆缸」的意思，指「中國古代帆船」。他也認為「巨蟒與夜明珠」的故事，為當時流行於南洋各地的一種傳說，其起源似乎為印度神話中的「那伽」（Naga）所演變。參見陳育崧：《婆羅史支那王傳說之研究》，椰陰館文存編委會：《椰陰館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學會，1983 年），頁 29。

37 自溫雄飛將 Ong Sum Ping 音譯為「黃森屏」，此後大部分中國史家沿用「黃森屏」作為 Ong Sum Ping 的中文譯名，本文的翻譯部分也暫且使用「黃森屏」。

安全回到船上，同時也取得了龍珠。那時，巨龍找了食物回來，看見牠的龍珠不見了，只剩下那個發出蠟燭光芒的玻璃盒子，便下山尋找牠那顆不知去向的龍珠。牠望見海上有龍珠的光芒，便跟著游向那兩艘正在行駛的船。巨龍越來越靠近，因為牠游得很快。黃森屏看到那隻巨龍時，巨龍已經非常靠近那兩艘船了。那位叫黃蓬剛的大臣也上來甲板，顧不得害怕。黃森屏想到把鐵燃燒成像炮彈一樣，直到燒成赤紅色。當巨龍靠近，張開大嘴想要抓住船，便把燒紅的鐵彈丟進牠的嘴裡。巨龍大約吞了二十至三十粒鐵彈，越遊越慢，沉入海底死了。

兩位大臣得到了龍珠后非常高興。船航行的過程中，黃蓬剛起了一個念頭：他想要把那顆龍珠掌握在自己手裡。他便跟黃森屏索要那顆龍珠。黃森屏說：「我也想要握有那顆龍珠，畢竟是我得到的，我想出了法子，龍珠才能得手的。」黃蓬剛說：「如果你不交出龍珠，我便毀了你的船。」黃森屏想了想，說：「我們為了爭奪龍珠而打起來有什麼意義？何況我們還是兄弟。」又說：「好吧，你把龍珠帶回去，我不跟你回去了。」黃森屏把龍珠交給他的兄弟黃蓬剛後，與船上所有的船員達成共識，他說：「好吧，我們轉舵往回走。」之後，他們朝汶萊河口航行，然後進入該地。這意味著黃森屏對他的兄弟黃蓬剛感到不悅，便定居在汶萊國。那個時候，阿旺・加臘・貝塔塔成為蘇丹，稱號為蘇丹莫哈末，蘇丹有一個女兒，那位公主長得很漂亮。過了沒多久，黃森屏向那位公主求婚，蘇丹莫哈末答應黃森屏的請求，以皇家儀式將公主許配給他。

過了不久，黃森屏的妻子生了一個女兒，長得很好看。之後，蘇丹莫哈末因賞識其女婿黃森屏的才能，便把國家交給黃森屏，封號為蘇丹阿末，他是汶萊王國第二任蘇丹。又過了沒多久，一位從塔伊夫國來的名叫沙里夫・阿里・貝爾法

> 基（Sharif ʿAli Bilfakih）的阿拉伯人來到汶萊。沙里夫是穆罕默德先知的後裔。不久后，沙里夫向蘇丹阿末的女兒求婚，蘇丹阿末便將女兒依據當時的皇家禮俗許配給他。沙里夫在汶萊奠定了伊斯蘭教，強化了伊斯蘭教法，並建造了回教堂。因此，蘇丹阿末把王位傳給他的女婿沙里夫・阿里，封號為蘇丹博卡（Sultan Berkat）。他就是汶萊第三任君主，也就是他命許多中國人和汶萊人合力建造了石頭城。蘇丹博卡擁有一個兒子，繼承其父蘇丹博卡的王位，封號為蘇丹蘇萊曼（Sultan Sulaiman），也就是汶萊第四任君主〔……〕[38]

一五九〇年手稿中提及了汶萊王國前六任國王的名字，依次為蘇丹尤索夫、蘇丹蘇萊曼、蘇丹薩蘭、蘇丹阿裡爾・魯拉、蘇丹努拉・阿蘭以及當時還未成為蘇丹的拉惹・汶萊。若將其對照上述兩份《世系書》的蘇丹莫哈末、蘇丹阿末、蘇丹博卡、蘇丹蘇萊曼、蘇丹卜基亞、蘇丹阿都・卡哈爾、蘇丹塞夫・里札爾、蘇丹沙・汶萊〔……〕初步比對之下，能夠相互對應只有一五九〇年手稿中的第二任王以及《世系書》中的第四任王——蘇丹蘇萊曼，還有前者的第六任王與後者的第八任王——蘇丹沙・汶萊（拉惹・汶萊）。換言之，一五九〇年手稿似乎漏記了汶萊前兩任國王，其故事裡的外來者第一任蘇丹尤索夫，應該便是第三任蘇丹博卡（即來自阿拉伯的沙里夫・阿里），[39]又或者是將前三任國王的事蹟一併記在其所謂的蘇丹尤索夫身上。西班牙人漏記、少記、錯記都是情有可原的，該手稿裡也這麼說了，因為汶萊王室歷代相傳刻有國王名字的金牌在一五七八年西班牙軍隊入侵時丟失了，所以當地老百姓可能早已遺忘了一些早期國王的人名。況且，西班牙人的資訊來源於呂宋島的他加祿穆斯林商人，而那些商人應該只是在當地經商旅行之際道聽途說，本身對汶萊國歷史的了解其實相當有限。另一方面，一五九〇年手稿裡「蘇丹尤索夫訪問中國並娶了中國國王親戚」的傳說，或許也是他們從當地人那裡聽來的，雖然故事

[38] P. L. Amin Sweeney, “Silsilah Raja-raja Berunai,” pp. 51-54.
[39] John S. Caroll, “Berunai In The Boxer Codex,” p. 17.

似乎不太真實，但我們能否從有關早期汶萊的現有史料中找出一些蛛絲馬跡呢？

肆、中國史料中的汶萊王國

事實上，古代汶萊政權的出現遠遠早於《世系書》裡所敘述的，蘇丹莫哈末應該只是第一位信奉伊斯蘭教並啟用「蘇丹」為封號的汶萊君王，但肯定不是汶萊歷史上的第一位君王。[40]根據中國史料記載，中國與古代汶萊政權的交往可能從南朝梁時已經開始，《梁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稱此國為「婆利[41]」，於公元五一八年、五二二年、六一六年、六三〇年、六六九年曾遣使中國。[42]北宋《太平寰宇記》、南宋《諸蕃志》裡稱「渤泥」，《宋史》稱之「勃泥」，九七七年、一〇八二年曾遣使中國。[43]元代《島夷志略》（1349 年）始稱此國「浡泥」。[44]上述記錄說明元代以前的中國王朝與古代汶萊政權（婆利、渤泥、勃泥或浡泥）

---

[40] Jamil Al-Sufri, *Tarsilah Brunei: Sejarah Awal dan Perkembangan Islam* (Bandar Seri Begawan: Jabatan Pusat Sejarah, 1990), p. 24.

[41] 關於中國史料中的「婆利」是否為古代汶萊的問題，有些學者有不同的意見。佈雷特施耐德（E. Bretshneider）最先提出「婆利」是「婆羅洲」，但伯希和（Paul Pelliot）持有異議，認為婆利更有可能是「巴厘島」。田汝康認為婆羅洲是個大島，過去與現在一樣，存在著許多政治性分區，而且這些政治性分區的界限和名稱多年來也許早已幾經改變，這也是造成其位置難以確定的部分原因。不過，關於浡泥/渤泥的爭議似乎要少得多，人們認為浡泥/渤泥是 Brni 的標音，後來又拼寫為 Brunei。參見田汝康：《沙撈越華人的早期歷史》；雲南民族大學編：《民族學報》第四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頁 109-110（原為田汝康 1953 年出版的 *The Chinese of Sarawak* 著作中的附錄）。

[42] 〔唐〕姚思廉：《梁書》卷五四（列傳第四八·諸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472；〔唐〕魏征等：《隋書》卷八二（列傳第四七·南蠻）（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209；（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九七（列傳第一四七·南蠻 西南蠻）（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3362；〔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列傳第一四七下·南蠻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4537。

[43] 〔宋〕趙汝适：《諸蕃志》卷上「渤泥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頁 23-25；〔元〕脫脫等：《宋史》卷四八九（列傳第二四八·外國五）（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9684。

[44] 〔元〕汪大淵著，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148。

已有一些官方交往。

明朝初期，中國與早期汶萊的外交往來更加頻繁，《明史》與《明實錄》稱此國為「渤泥」或「婆羅[45]」，洪武三年（1370 年）八月命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其國，渤泥國王馬合謨沙傲慢不為禮，秩責之[46]，始下座拜受詔。[47]洪武四年（1371 年）八月，渤泥國王馬合謨沙遣其臣亦思麻逸進表箋，貢方物。[48]永樂三年（1405 年）十一月，渤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遣使臣生阿烈伯成等奉表，貢方物。[49]同年十二月，遣使賫詔封渤泥國麻那惹加那乃為王，給印誥[50]、敕符、勘合，並賜之錦綺彩幣。[51]永樂四年（1406 年）十二月，渤泥國王、娑羅國東王、西王[52]各遣使奉表朝

[45] 林遠輝、張應龍認為明代史料中的「渤泥」、「婆羅」和「汶萊」都是指同一個國家。《明史·外國列傳》之所以把「渤泥」和「婆羅」列為兩個國家，源於張燮搞不清楚「渤泥」和「汶萊」是同一個國家不同時期的稱呼，在其《東西洋考》中把「渤泥」視為與之音近的「大泥」，而分別記作「大泥（渤泥）」和「汶萊（婆羅）」兩國。參見林遠輝、張應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54-55。

[46] 起初，馬合謨沙認為渤泥當時是闍婆（滿者伯夷）的屬國，怕遣使中國會受到闍婆人報復，而對明朝使臣傲慢無禮，沈秩責之。馬合謨沙仍以「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為所掠」為由，要求三年後才到明廷朝貢，沈秩則回答「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他爾」。隔天，馬合謨沙與其宰相王宗恕商量後，同意向明廷朝貢。之後，馬合謨沙又受闍婆人離間而生疑，沈秩幾次奔走解釋，最終才讓馬合謨沙心悅誠服，完全打消了來明廷朝貢的疑慮。關於張敬之、沈秩使渤泥國蘇丹馬合謨沙的始末，可見於宋濂根據沈秩的口述而撰寫的《勃尼國入貢記》，收錄於《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五。

[47]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列傳第二百十三 外國六）（長沙：岳麓書局，1996 年版），頁 4818。

[4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太祖實錄》卷六十七（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頁 1264。

[4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卷四十八，頁 0733。

[50] 我認為永樂皇帝御賜渤泥國王的印誥便是一五九○年手稿裡提到的中國國王賜給蘇丹尤索夫的象徵王室的徽章。羅歐和穗尼的文章裡也提到的來自中國的 Kemahib 或 Kamanah，作為早期渤泥國傳承王位的信物之一，然而，所有的王室信物在一六六一年至一六七四年的宮廷內戰中被弒君篡位的蘇丹哈庫·慕賓用大炮轟入海中。

[5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卷四十九，頁 0737。

[52] 關於《明實錄》中永樂四年十二月渤泥國王、娑羅國東王和西王的使者同一時間來到中國朝貢的記錄，以及僅兩個月後（永樂五年二月）娑羅國王又遣使朝貢，不能說明「渤泥」和「婆羅」是不同的國家。林遠輝、張應龍認為在《明史》、《明實錄》和《東西洋考》中，記載永樂時期（1403-1424 年）渤泥、婆羅、娑羅入貢的，只有渤泥有國王名字，而婆羅和娑羅卻一次也沒提到。這可以說明婆羅以及娑羅的東、西王所遣的使節其

貢。[53]永樂五年（1407 年）二月，娑羅國王遣使莫剌加遁等朝貢。[54]永樂六年（1408 年）八月，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其妃及弟妹、男女，並陪臣來朝。[55]同年十月，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以疾卒於會同館。上輟朝三日，遣官祭之，賻以繒帛。東宮暨親王各遣祭。命工部具棺槨、明器葬於安德門外。[56]十一月，賜故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謚曰「恭順」，其子遐旺襲封。[57]遐旺與其叔父施里難那喏等請求將原本歲貢給爪哇國王的片腦轉而歲進明廷；請求派遣使臣護送其回國，留鎮一年；並乞定朝貢期及傔從人數。皇帝答應其全部請求，命三年一貢，傔從惟王所遣，遂敕爪哇國免其歲供。[58]十二月，遣中官張謙、行人周航護送嗣浡泥國王遐旺等還國，並錫封王國中之山為長寧鎮國之山。[59]永樂八年（1410 年）九月，中官張謙、行人周航使浡泥國還。其國王遐旺遣其叔蔓的里哈盧等一百八十人偕來，貢方物謝恩。[60]永樂九年（1411 年）二月，遣中官張謙、行人周航等賚敕使浡泥國，賞賜其王遐旺與其頭目。[61]永樂十年（1412 年）八月，浡泥國王遐旺偕其母、妻等來朝，[62]永樂十一年二月（1413 年）辭歸。[63]永樂十三年（1415 年）二月，浡泥國王遐旺遣使生阿烈微喏耶沙扮等等二十九人貢方物。[64]永樂十五年（1417 年）十月，浡泥國王遐旺遣叔祖麻木等貢方物。[65]永樂十九年（1421 年）五月，浡泥國王叔祖須麻億等九十二人來朝

實是當時汶萊的一些商人假借奉使朝貢為名，到中國進行貿易。因為他們不是國家派來的，所以不敢提國王的名字，只能利用音譯上的不同編造出「娑羅」等不同的國家。參見林遠輝、張應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頁 55。

5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卷六十二，頁 0897。
5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卷六十四，頁 0912。
5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卷八十二，頁 1106。
5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卷八十四，頁 1117。
5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卷八十五，頁 1127。
58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列傳第二百十三 外國六），頁 4819。
5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卷八十六，頁 1133。
6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卷一〇八，頁 1398。
6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卷一一二，頁 1438。
6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卷一三一，頁 1617。
6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卷一三七，頁 1668。
6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卷一六一，頁 1831。
6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卷一九三，頁 2038。

貢方物。[66]洪熙元年（1425 年）十二月，渟泥國王遐旺遣叔沙那萬喏耶率頭目生阿烈等來朝，貢方物。[67]宣德元年（1426 年）三月，渟泥國王叔沙那萬喏耶等陛辭，宣宗皇帝以渟泥國王父子自成祖以來忠誠逾篤，加倍賞賜遐旺。[68]

若將上述明代資料對照《世系書》，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洪武三年（1370 年）奉命出使的張敬之、沈秩見到的渟泥國王馬合謨沙應該就是《世系書》裡所謂的第一位汶萊蘇丹莫哈末（Sultan Muhammed 或 Sultan Muhammad Shah），如今汶萊歷史研究中心（Pusat Sejarah Brunei）與官方認定其在位時間介於一三六三年至一四〇二年。[69]儘管明代史籍裡繼馬合謨沙之後成為國王的麻那惹加那乃和遐旺，與《世系書》的說法有很大的出入[70]。這或許是由於麻那惹加那乃在位時間太短，而遐旺繼位時尚且年幼（年僅四歲），未到成年便夭折了，渟泥國實權仍由馬合謨沙之弟（蘇丹阿末）掌握，[71]其真實情況已不得而知。 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歷史上的確曾有兩任汶萊國王去過中國，其中麻那惹加那乃於一四〇八年帶領其

6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卷二三七，頁 2274。

6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宣宗實錄》卷十二（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頁 0319-0320。

6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明宣宗實錄》卷十五，頁 0398。

69 Jabatan Perkembangan Kurikulum Kementerian Pendidikan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Sejarah Sultan-sultan Brunei*, (Bandar Seri Begawan: Syarikat Pencetakan Juta Jaya, 2015), p. 4；文萊歷史研究中心官方網站上也有「蘇丹世系表」可供下載（網址：http://www.pusat-sejarah.gov.bn/Info%20Sejarah/INFO%20SEJARAH.asp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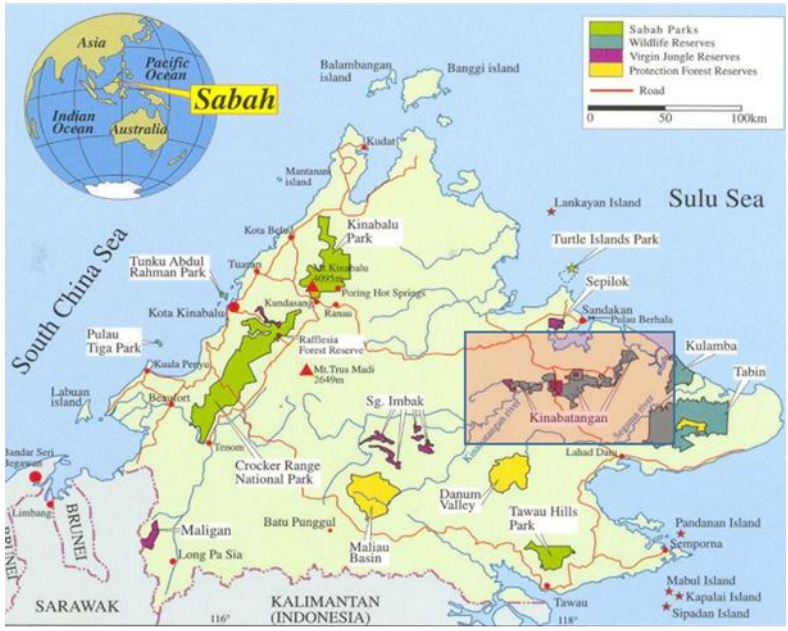
70 根據各版本《世系書》的說法，第一任蘇丹莫哈末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但當地學者發現在斯里巴加灣位於萊西登西路（Jalan Residency）的一個墓碑文字顯示，蘇丹莫哈末有一個兒子名叫蘇丹阿都·馬基（Sultan Abdul Majid）。因此，當地汶萊史家在參考了該墓碑文字和明史之後，認為蘇丹莫哈末應該有一個兒子，即蘇丹阿都·馬基，和明史中的麻那惹加那乃是同一個人，於一四〇二年繼位，一四〇八年死於中國。接下來則又回到《世系書》的說法，認為蘇丹莫哈末的弟弟帕提·伯拜（Patih Berbai）在蘇丹阿都·馬基死後掌握實權，是為汶萊第三任君主蘇丹阿末，在位時間介於一四〇八年至一四二五年，與明史中的麻那惹加那乃之子遐旺的在位時間完全重疊。然而，明史卻記載永樂皇帝命麻那惹加那乃之子遐旺襲封，並不是《世系書》裡說的蘇丹莫哈末的弟弟。明史也記載渟泥國於一四一〇年、一四一二年、一四一五年、一四一七年、一四二一年、一四二五年六次來朝，都明確提及派遣使者的渟泥國王是遐旺，其中一四一二年遐旺更是親自前來，很難相信明朝史官會連續記錯那麼多次。

71 Jamil Al-Sufri, *Tarsilah Brunei: Sejarah Awal dan Perkembangan Islam*, Jabatan Pusat Sejarah, 1990, pp. 24, 53.

子遐旺、家人與陪臣來朝，旅途中病死葬於南京，而其子遐旺於一四一二年又偕母、妻等再次來朝。兩任汶萊國王曾經訪問中國並得到中國皇帝冊封的歷史事實，或許也為一百多年後的汶萊當地人或呂宋島的他加祿商人們提供了一些創作「汶萊國王訪問中國並迎娶中國國王親戚」故事的靈感。

上述兩份《世系書》裡也提到了蘇丹莫哈末或蘇丹阿末娶了一位從中國巴當岸帶回來的「中國國王親戚」，與一五九〇年手稿裡的蘇丹尤索夫娶「中國國王親戚」的傳說似乎也有關聯。英國學者羅歐在其一八八〇年的文章裡說道：「婆羅洲北部和東北部的開發一定從早期就開始了，這引起了中國人極大的關注，例如該地區最長的河流和最高的山脈，即 China Batangan 河和 China Balu 山的名稱就說明了這一點；在那裡可以找到大量的燕窩、海參、魚翅、婆羅洲樟腦和珍珠，在婆羅洲的其他地方都找不到這些，並將其出口到中國去。忽必烈於一二九二年那次發往印尼群島未成功的探險，可能也到了這個地方，可能是給婆羅洲帶來了王子或公主〔……〕中國人很有可能在巴當岸有一個定居地或作坊。第二任君主蘇丹阿末的妻子從那兒來，就像在某些版本的《世系書》中明確指出的那樣，她是蘇丹從那裡帶來的。」[72]

[72] Hugh Low, “Selesilah(Book of the Decent) of the raja Bruni,” *Journal of the strait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5(June, 1880), p. 6.



【圖二】汶萊右側有座「龍山」（京那巴魯山），龍山右側即京那巴當岸地區[73]

正如羅歐所說的，《世系書》裡所謂的「中國巴當岸」並不在中國境內，而指的是今沙巴境內最長的河——巴當岸河（Sungai Batangan）流域，如今該地的確仍被稱為「京那巴當岸」（Kinabatangan），隸屬於沙巴州山打根省之下的一個縣名，「Kina」一詞便是源自「China」。再來，《世系書》B 手稿提到 Ong Sum Ping 奪取龍珠的「中國巴魯山」，也就是如今沙巴的京那巴魯山（Gunung Kinabalu）。早在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1349 年）裡便曾提及浡泥國右側有座「龍山」，[74]之所以稱之為「龍山」應該是與當地人傳說該山中住著巨龍或藏著龍珠有關係，雖然「龍」只是古代人的想像，但這間接說明了 Ong Sum Ping 奪取龍珠並打敗

[73] 圖來源：作者於網上搜索圖片進行加工（原圖取自 Bike & Tours 網站：https://www.bikeandtours.com/en/sabah-map）。

[74] 《島夷志略》「浡泥」條開篇便稱：「龍山礪碍於其右。基宇雄敞，源田獲利……」。參見〔元〕汪大淵原著，蘇繼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148。

巨龍的傳說並不完全是憑空捏造的。或許元代以後有許多中國人在此處附近定居，當地人常在這一帶看見中國人，才改稱此山為「中國巴魯山」。該山除了有 Ong Sum Ping 偷取龍珠的傳說外，仍有一則「中國寡婦」的傳說而聞名，所以當地人又稱其為「中國寡婦山」[75]。這些有關中國人的傳說和以「中國」命名的地名，反映了中國人移民到北婆羅洲一帶由來已久。此外，《島夷志略》（1349 年）也提到「（渟泥國人）崇奉佛像為嚴，尤敬愛唐人，醉也則扶之以歸歇處」[76]；費信的《星槎勝覽》（1436 年）也稱「其國之民崇佛像，好齋沐。凡見唐人至其國，甚有愛敬，路有醉者，則扶歸家寢宿，以禮待之若故舊」[77]；宋濂（1310-1381 年）的《勃尼國入貢記》裡提及國王馬合謨沙有個宰相名叫王宗恕；[78]張燮的《東西洋考》（1617 年）則稱汶萊「俗傳今國王為閩人，隨鄭和征此，留鎮其地，故王府旁舊有中國碑」[79]；《明史》也記載「華人多流寓其地。嘉靖（1522-1566 年）末，閩、粵海寇遺孽逋逃至此，積二千餘人」；萬曆（1573-1620 年）中也有漳州張姓者在渟泥朝中擔任尊官（那督）。[80]不僅如此，一九七二年在汶萊斯里巴加灣的一座穆斯林公墓內發現一座宋代墓碑，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據考證其墓主為南宋泉州道判院蒲宗閔之墓（1264 年）。[81]上述史書記錄與考古遺存可說明至少在南宋時中國人的足跡已至北婆，中國人深受當地人歡迎，元代以後已有一些中國人移民到此處，至十五世紀前後當地可能已形成相當規模的中國聚落，一些中國人在

[75] 該傳說的結局有很多版本，故事經過大致都是說有一個中國商人來到渟泥，與當地一位美麗的卡達山族姑娘結為夫妻。後來，中國商人要回國，曾許諾會再回來，誰知一去不回。妻子每天來到山上遙望北方，期盼她能看到中國夫君回來。一說直到那位妻子老死，都等不到夫君；另一說那位妻子因絕望而投湖殉情；還有一說該妻子變成了山上一塊石頭，永遠守望著北方的中國。「京那」（Kina）是卡達山語「中國」之意，「巴魯」（Balu）為「寡婦」之意。

[76] 〔元〕汪大淵原著，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頁 148。

[77] 〔明〕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年），頁 14。

[78] 〔明〕宋濂：《勃尼國入貢記》，《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頁 919-921。

[79] 〔明〕張燮：《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67。

[80]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列傳第二百十三 外國六），頁 4821。

[81] 聶德寧、張元：《牽星過洋——福建與東南亞》（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 年），頁 32。

早期汶萊朝中擔任高官，甚至是建立了以華人移民為主體的小型王國。羅歐認為第二任蘇丹阿末娶的中國妻子便是中國巴當岸首領 Ong Sum Ping 的女兒或妹妹，[82]卡羅爾以及當代大部分汶萊史學者均對羅歐的看法表示贊同。至於忽必烈時派往爪哇島的蒙古軍隊是否也到過北婆？該軍隊中是否有王子或公主隨行並留在婆羅洲？一些西方學者之間雖有「蒙古軍隊征服婆羅洲並置行省」的傳聞，[83]但《元史》並無相關記載[84]，在沒有確實證據的情況下，我暫且對羅歐的上述說法持保留態度。

因此，《世系書》裡說蘇丹娶了一個來自巴當岸中國國王親戚的妻子，應該將該「中國國王」理解成北婆巴當岸地區的中國移民首領，該中國妻子便是該地中國移民首領的親屬。這或許是阿旺・加臘・貝塔塔一次改變汶萊命運的重要決策，十四世紀中葉，他與兄弟從加里曼丹東部移民到汶萊[85]，先是在胡魯・林邦（Hulu Limbang）落腳，后在汶萊河沿岸甘榜・亞逸（Kampong Ayer）建立新的政權，[86]或許為了藉助當地中國人的力

---

[82] Hugh Low, "Selesilah(Book of the Decent) of the raja Bruni," p. 24.

[83] 如古爾德（S. B. Gould）和邦姆菲爾德（C. A. Bampfylde）合著的 *A history of Sarawak under its two White Rajahs 1839–1908* (London: Henry Sotheran, 1909), pp. 36–37，以及休斯（Hughes-Hallett, H. R.）的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Brunei(*Journal of the strait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8, No. 2 (1940)), p. 24。

[84] 溫雄飛曾對此評論說：「是以西人之述婆羅洲者，亦有自炫通博。謂元人曾征婆羅洲。然此事元史不載，反東鱗西爪，見於西人載籍。大意均謂元人征服婆羅洲，置行省，委行政長官以治理之。此殆西人遊歷旅行家之所紀，而非史地學者研究之結果。」參見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上海：上海東方印書館，1929 年），頁 64。

[85] 各個版本的《世系書》及其他現有史料都沒有提及阿旺·加臘·貝塔塔及其弟弟的來歷，但根據當地人的詩歌和口頭傳統，他們來自加里曼丹東部的提東政權（Kerajaan Tidung）。參見 Haji Abdul Karim Bin Haji Abdul Rahman, *Sejarah Pengasasan dan Asal Usul Kerajaan Brunei Berdasarkan Sumber Lisan* (Falkutal Sastera dan Sains Sosial Universiti Malaya, 2016), pp. 47, 182, 255, 404。

[86] 根據考古發掘，早期渟泥政權（十至十三世紀）建立在林邦河（Sungai Limbang）以南的德魯三·庫邦（Terusan Kupang），在那裡發現大量宋代（960-1290 年）陶瓷碎片，顯示該地是早期渟泥政權的中心。或許阿旺·加臘·貝塔塔於十四世紀中葉來到汶萊，早期勃泥政權已經衰落，他便在汶萊河附近建立了新的政權。參見 Haji Abdul Karim, *Sejarah Pengasasan dan Asal Usul Kerajaan Brunei Berdasarkan Sumber Lisan*, p. 86。另有一個說法是現有汶萊政權與東南亞大陸早期統治扶南（Funan）的王室家族有所聯繫。扶南王室家族在七世紀初被真臘滅國後開始往海上遷徙，一些人來到爪哇建立了夏連特拉王朝（Sailendra Kingdom，即今爪哇日惹的婆羅浮屠建立者），數世紀之後又來到婆羅洲建立新政權。桑德斯認為有關阿旺·加臘·貝塔塔的故事出現於汶萊灣及其他更遠地區的當地

量，以取得北婆一帶的領導權，便與巴當岸中國國王（移民首領）相互聯姻[87]。其中，阿旺・加臘・貝塔塔的女兒嫁給了中國巴當岸國王，其弟弟蘇丹阿末則娶了「中國國王的親戚」（中國移民首領的妹妹或其他親戚[88]）。之後，外來者尤索夫（來自阿拉伯的沙里夫・阿里）又娶了蘇丹阿末擁有中國血統的女兒，憑藉著這層親戚關係，他便得以號召當地中國移民建立《世系書》裡所說的「石頭城」，[89]並遷都該城。從汶萊早期蘇丹的歷史和傳說中出現許多有關中國人的敘述，顯示中國移民與汶萊王室確實擁有深厚的淵源。

其實，一五九〇年手稿的故事裡說該女是「中國國王的親戚」，跟十八至十九世紀編輯成書的《世系書》（即《A 手稿》、《石碑版》、《可素瑪手稿》）中該女是來自巴當岸的「中國國王的親戚」，意思本來是一樣的。可見早期汶萊蘇丹娶了「中國國王的親戚」（發生於約十四世紀末十五世紀初）的說法在十六世紀末仍存在於當地人的口頭傳統中，陰錯陽差地被寫入一五九〇年的西班牙手稿後，這個說法在當地又傳承了一百多年，直到一七三五年才被載入最初起草的《世系書》中。兩方敘述的故事情節之所以產生歧異，關鍵出在那些不太熟悉汶萊歷史的他加祿商人，當他們從當地人那裡聽到該位嫁給蘇丹的中國女子是「saudara raja China」（中國國王親戚）時，也許他們誤以為該「raja China」（中國國王）就是君臨中國大陸的皇帝，又曾聽聞當地人說起汶萊蘇丹曾經去過中國並接受

人傳說中，反映的是一個基本事實：一群人抵達汶萊灣，征服了現有居民，建立了一個新政權，然後將其權力擴展到了沿海地區。詳見於 Graham Saunders, *A History of Brunei*,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1。

87 上文已知阿旺·加臘·貝塔塔來到汶萊所建立的政權是新的政權，並非是早期勃泥政權的延續。我認為，他作為一個外來者，不可能初來乍到就能讓所有當地人與政權自動臣服於他，或是如一些當地學者推斷早期渤泥政權已經沒落或完全消失無蹤，似乎他理所當然地補上當地權力的真空。上述假設不太可能，肯定是曾經歷過一系列的外來者與當地舊有的內外勢力的領導權爭奪戰。因此，他勢必要與一些當地或外來勢力合作，以壓倒北婆一帶的其他新舊勢力，很可能這就是他與巴當岸中國首領相互聯姻的主要目的。同樣地，娶柔佛（淡馬錫）王室女子並向明朝中國朝貢，也是他尋求外力以鞏固統治、抵禦外敵（滿者伯夷和蘇祿）的外交策略。

88 「saudara」一詞在馬來語中用途較為寬泛，可以指「兄弟姐妹」，任何有血緣關係的「近親」、「遠親」，某些情況下甚至可指沒有血緣關係的「好朋友」。

89 John S. Caroll, “Berunai In The Boxer Codex,” p. 18.

皇帝冊封的史事，便將兩件事情合為一談，再自己加油添醋，編造出了「蘇丹尤索夫訪問中國同時娶中國國王親戚」的故事，說給正準備攻打汶萊王國的西班牙總督桑德聽，某位通曉馬來語的西班牙通譯員便將這個故事記錄在其報告中，過後又被達斯馬里納斯的秘書抄錄於一五九〇年的手稿中。另一方面，一五九〇年手稿裡的故事並沒有在任何版本的《世系書》裡出現過，也可以說明這極大可能是由那些他加祿穆斯林在曲解了當地人敘述的情況下，自己附會編造出來的。對於他們來說，敘述該故事的動機可能是要向西班牙官員解釋作為外來者的蘇丹祖先之所以能夠成為汶萊統治者的歷史憑藉，因為蘇丹祖先既有穆罕默德先知的思想傳承，也曾經娶過中國國王親戚之女，其後代擁有中國王室的血統。正如安東尼・瑞德在點評馬六甲版、汶萊版和滿者伯夷版三則「中國公主」的故事時所說；「在古代東南亞的歷史文本中，中國往往被描繪成一個遙遠且強大的國家〔……〕這些穆斯林國家的官方史書裡往往會編造與敘述一個不太合理，但在文化上更容易使人接受的中國公主故事，由中國皇帝派遣公主嫁給當地國王，從而提高其王室的地位」。[90]

不過，對於當地人來說，該「中國國王親戚之女」的歷史地位似乎不太顯著，目前並沒有發現任何以該女為主角的傳說或故事流傳下來，反而是那位據說是巴當岸中國國王的 Ong Sum Ping，有關其來歷以及相關的傳說與揣測數不勝數，至今仍為學者們與當地人們津津樂道。

伍、近當代外國、中國、本地學者筆下的 Ong Sum Ping 與中國公主

該巴當岸的中國國王是否就是 Ong Sum Ping？歷史上是否真有其人？一五九〇年手稿只提及第一任蘇丹尤索夫前往中國，並且娶了中國國王親戚。一七三五年起草並於一八〇七年成書的《A 手稿》、一八〇四年篆刻

[90] Anthony Reid, *Imperial Alchem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1.

的《石碑版》以及一八三一年的《可素瑪手稿》中，只提及蘇丹娶了來自中國巴當岸的中國國王親戚為妻，並無提及 Ong Sum Ping 這個人，更沒有說中國巴當岸王就是 Ong Sum Ping。羅歐文章第一部分 *Selesilah（Book of the Decent） of the raja Bruni*（成書年代介於 1828-1852 年）完全沒有提及巴當岸的中國國王，但花了一些篇幅敘述 Ong Sum Ping 的來歷，說他是中國皇帝派來尋找中國巴魯山龍珠的兩位大臣之一，移居到汶萊後娶了蘇丹莫哈末的女兒，繼位為第二任蘇丹阿末，其女兒又嫁給了來自阿拉伯的沙里夫・阿里。一九三六年成書的《B 手稿》則明確地稱第一任蘇丹莫哈末娶了來自巴當岸的中國國王親戚之女，也沒有說該巴當岸的中國國王是誰，但也花了相當多篇幅敘述 Ong Sum Ping，最後他娶了蘇丹莫哈末之女，成為第二任蘇丹阿末。一九三八年成書的《卡瑪魯丁手稿》中 Ong Sum Ping 的故事篇幅更長，加插了一些此前版本都沒有的敘述，其中較值得注意的是在黃蓬剛要挾他交出龍珠之後，他本來想回到中國巴魯山，卻誤把今汶萊以南的「姆魯山」（Gunung Mulu）當成是「中國巴魯山」而迷路，結果便直接到了汶萊，[91]也就是說他根本沒有時間或機會去到中國巴魯山以東的巴當岸成為「中國國王」，[92]就已來到了汶萊娶了蘇丹莫哈末之女，之後成為第二任蘇丹阿末，[93]還說「石頭城」是由他號召中國移民建的。[94]換句話說，沒有任何一個版本的《世系書》曾明確提到 Ong Sum Ping 便是巴當岸中國國王。

最早將「巴當岸中國國王」與「Ong Sum Ping」相互聯繫起來的便是英國學者羅歐，於其一八八〇年的文章第四部分「汶萊穆罕默德君王清

[91] 京那巴當岸地區緊鄰京那巴魯山的東部，汶萊在京那巴魯山數百公裡外的西南邊，而姆魯山在汶萊的更南邊，與京那巴當岸地區距離更遠。因此，若依照《卡瑪魯丁版本》中 Ong Sum Ping 一群人因迷路而直接到達汶萊的說法，他不可能是中國巴當岸的中國首領，因為他根本沒到過巴當岸。

[92] 事實上《B 手稿》也稱他與部下轉舵朝汶萊河口航行，然後進入汶萊王國，根本沒提到他與巴當岸有任何關係。

[93] Haji Abdul Karim Bin Haji Abdul Rahman, *Sejarah Pengasasan dan Asal Usul Kerajaan Brunei Berdasarkan Sumber Lisan* (Falkutal Sastera dan Sains Sosial Universiti Malaya, 2016), pp. 120-121.

[94] Haji Abdul Karim Bin Haji Abdul Rahman, *Sejarah Pengasasan dan Asal Usul Kerajaan Brunei Berdasarkan Sumber Lisan*, p. 125.

單」中明確指出「巴當岸中國國王」就是「Sum Ping」，[95]但他沒有補充說明這個說法到底是參考了哪份手稿，或是從哪位可靠的信息人口中得知的[96]。不過，他的說法得到了後來幾乎所有中、外、本地學者的認同。另一方面，根據羅歐和卡羅爾的說法，十八至十九世紀初《世系書》的編輯者有隱晦早期蘇丹世系中有中國血統的嫌疑，這也許是跟一六六〇至一六七四年發生的宮廷內戰——「親戚之戰」（Perang Saudara[97]）有所關聯[98]。或許是為了重新詮釋這場宮廷內戰的歷史和蘇丹世系中的中國血統傳承，促使此後歷朝蘇丹都敕令其廷臣編纂與修訂《世系書》[99]。因此，十九世紀中葉

---

[95] Hugh Low, "Selesilah(Book of the Decent) of the raja Bruni," pp. 24.

[96] 或許是羅歐自作主張地將「Ong Sum Ping」與「中國巴當岸王」兩者聯繫起來，也可能是他從那位名叫可素瑪親王的資料提供者兼信息人那裡得知的。

[97] 這場宮廷內戰因一次鬥雞比賽而起。蘇丹莫哈末·阿里（Sultan Muhammad Ali, 1660-1661）的兒子與哈庫·慕賓親王的兒子鬥雞輸了，被後者嘲笑而將其殺害。哈庫·慕賓親王為報殺子之仇，帶領其跟隨者發動政變，將蘇丹莫哈末·阿里殺死，自立為蘇丹哈庫·慕賓（Sultan Hakkul Mubin, 1660-1673）。事後，他試圖通過任命前蘇丹莫哈末·阿里的孫子慕希丁為宰相來安撫前蘇丹的追隨者，但慕希丁在前蘇丹追隨者的支援下反抗蘇丹哈庫·慕賓。哈庫·慕賓被迫遷至哲敏島（Pulau Chermin），而慕希丁又自立為蘇丹慕希丁（Sultan Muhyiddin, 1674-1690），雙方展開了長達十三年的內戰，最終由蘇丹哈庫·慕賓被殺死而結束，汶萊史上稱「親戚之戰」（Perang Saudara）。

[98] 羅歐指出可素瑪親王提供給他的資料與信息中，蘇丹世系傳承有三個源頭：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旺·加臘·貝塔塔；柔佛王室之女；還有阿拉伯先知。然而，來自中國的血統傳承似乎故意被忽略了。參見 Hugh Low, "Selesilah(Book of the Decent) of the raja Bruni," pp. 24。卡羅爾認為羅歐的猜測是正確的，《世系書》曾被匿名的編輯者修改過，但他們忘記刪除掉一些中國元素（如某些版本忘記刪除「巴當岸中國國王」）。早期成書的《世系書》完全不提親戚之戰，後期成書的版本才把弒君篡位並銷毀了王室信物柔佛王冠和中國 Kamanah 的哈庫·慕賓列入蘇丹世系中。他認為中國的 Kamanah 便是中國皇帝賜給蘇丹尤索夫的信物，尤索夫應該就是第三任蘇丹沙里夫·阿里，曾召集當地中國移民建立石頭城，間接地證實了一五九〇年手稿裡蘇丹尤索夫前往中國娶中國國王親戚的事（或許只是中國巴當岸王 Ong Sum Ping 的親戚），然而嫁給蘇丹的中國女子應該只是妾室，或許是正妻的後裔有意把早期蘇丹擁有中國血統的淵源從王統世系中刪去，以削弱中國妾室後裔在朝中的勢力以及繼承蘇丹王位的權力。參見 John S. Caroll, "Berunai In The Boxer Codex," p. 18。

[99] 自從記錄歷代國王名字的金牌於一五七八年西班牙人入侵時丟失之後，汶萊歷代國王世系有很長一段時間只是在宮廷裡口耳相傳，沒有出現任何書面記錄。一直到一六六一年至一六七四年的親戚之戰結束，蘇丹慕希丁戰勝了蘇丹哈庫·慕賓後，才有了重新敘述「王室世系」的必要，以便讓後代子孫知曉。一七三五年，第一份《世系書》手稿由一位早在蘇丹慕希丁時已在朝中的廷臣雅庫布起草，再由拉蒂夫於一八〇七年續寫完成，這份手稿乾脆完全不提親戚之戰，並把此次內戰的始作俑者蘇丹哈庫·慕賓排除在蘇丹世系以外。一八四一年以後成書的手稿才將這場汶萊史上重要的內戰納入歷史敘述中，並

以後的《世系書》修訂者在其中又加入了「Ong Sum Ping」這個中國名字和其故事作為早期蘇丹世系內擁有中國血統的重要證明，甚至把他說成是第二任蘇丹阿末。雖然種種跡象均能表明早期汶萊蘇丹王室應該曾與中國人通過婚，其王室世系裡擁有中國血統傳承，但「Ong Sum Ping」這個人物與名字顯然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才加上去的[100]，並且他就是中國巴當岸國王的說法，仍是有待商榷的。

最早談及 Ong Sum Ping 的中文著作，是民國時期的華僑史家溫雄飛於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南洋華僑通史》，將「Ong Sum Ping」譯為「黃森屏」。書中專闢一章（第十章《元末明初之國人海外事業》）曆數元末明初黃森屏、梁道明、汪直、林道乾等[101]在南洋拓殖與稱王的事蹟。溫雄飛書中引述羅歐發表的《世系書》[102]中有關 Ong Sum Ping 的故事，但因中國史書無載其名其事，故推測他應該不是明廷派往汶萊的大臣，可能本是海盜或為官軍所逼，於洪武八年（1375 年）率領一批中國人移民來到北婆，而「奉王命採辦龍珠」可能只是他不想讓當地人畏疑的說辭。[103]該位嫁給國王馬合謨沙的黃森屏之女，他認為：「必非黃之親女，必其來時，掠諸

將蘇丹哈庫·慕賓列入蘇丹世系中。參見 Haji Abdul Karim Bin Haji Abdul Rahman, *Sejarah Pengasasan dan Asal Usul Kerajaan Brunei Berdasarkan Sumber Lisan*, pp. 107-112, 136-137。

100 除了十九至二十世紀成書的《世系書》有 Ong Sum Ping 的故事之外，在汶萊社會流傳的一首詩歌《阿旺·瑟瑪溫詩》（Syair Awang Semaun）裡也有其故事，該詩歌裡他名叫「Awang Sunting」、「Wang Sunting」或「Ong Sunting」，說他原本是中國皇帝的兒子，因尋找龍珠來到汶萊，娶了蘇丹莫哈末之女，被封為「馬哈拉加·雷拉親王」（Pengiran Maharaja Lela）。此外，一九○三年三巴斯蘇丹莫哈末·沙菲尤丁二世（Sultan Muhammad Shafiyuddin II）參考《世系書》撰寫的《三巴斯王室世系書》（*Salasilah Raja-raja Sambas*），也有幾乎一樣的 Ong Sum Ping 的故事，故事裡他名叫「Awang Santing」，娶了蘇丹莫哈末之女，繼任為第二任蘇丹阿末。

101 黃森屏是該章首先介紹的人物；梁道明是明洪武永樂年間在蘇門答臘舊港稱王的華人首領，曾接受明成祖招安；汪直是明嘉靖年間活躍於東亞海域的大型武裝海商集團（倭寇）首領；林道乾是明隆慶萬歷在東南沿海一帶活躍的潮籍海盜首領，後移居到北大年受到暹王賞識任高官。上述幾人外，該章提及的人物還有張璉、陳祖義、張汝厚、林福等。

102 溫雄飛錯誤地把《汶萊王室世系書》指為《蘇祿王室世系書》，參見 Johannes L. Kurz, “Making history in Borneo： Ong Sum Ping and his others during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Vol. 14(2), 2018, p. 81。

103 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上海：上海東方印書館，1929 年），頁 64-66。

貧家，偽為己女〔……〕使嫁土酋，締姻好之後，土酋當然劃一大區域，使同來之中國人，生聚其中，黃森屏則為之長。此所以有中國皇帝、中國總督之稱。」[104]為了強調黃森屏真有其人，他也在書中透露自己有一位同鄉友人黃卓如，二十年前（1909 年左右）到汶萊經商時受到汶萊蘇丹禮遇，有幸參加王室祭墓典禮，隨蘇丹至市郊一英里許，在一座山巔上發現一個古墓，「隱隱若有中國字，然已漫漶不可讀，乃取草紙捫而拓之，得五個大字，曰『黃總兵之墓』」。因此，他認為該墓「當然為黃森屏之墓，可無疑矣。以世系書核之，黃森屏實為該蘇丹二十代前之外王祖父。」[105]李長傅在其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國殖民史》裡也提及了 Ong Sum Ping，將其譯為「黃昇平」，他引述了羅歐的文章，並對溫雄飛的大部分說法表示贊同，認為「其推定尚可信」，但覺得溫雄飛「嫁給蘇丹之女並非黃之親女」的說法未免故甚其辭。[106]對於西人學者所謂的「元朝軍隊於一二九二年在北婆建立行省並由黃森屏（或黃昇平）擔任中國總督」，溫雄飛和李長傅皆認為這只是附會的說法。[107]

上述兩位華僑史家如此熱衷討論 Ong Sum Ping，主要是受了梁啟超的「華僑史」開山作之一《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的影響。梁啟超在該文中將梁道明等「八君子」[108]與西方殖民偉人相提並論，認為：「謂得一人足以光國史也〔……〕以吾所述八君子者，以泰西史上人物較之，非摩西則哥侖布、立溫士頓也，否則亦克雷武、維廉濱也[109]。而試問四萬萬國民中，能言八君子之事業者幾人？豈惟事業，即姓名亦莫或聞知也

104 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頁 66。

105 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頁 66-67。

106 李長傅：《中國殖民史》（上海：上海書店，1937 年），頁 95-97。

107 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頁 66、67；李長傅：《中國殖民史》，頁 95-97。

108 梁啟超文中讚揚的八大偉人是三佛齊國王梁道明、三佛齊國王張璉、婆羅國王某、爪哇順塔國王某、暹羅國王鄭昭、戴燕國王吳元盛、昆甸國王羅大（羅芳伯）、英屬海峽殖民地開闢者葉來（葉亞來）。

109 梁啟超文中提及的西方殖民偉人：摩西（Moses）即《舊約聖經》中帶領猶太奴隸逃出埃及到達應許之地迦南的猶太領袖；哥崙布（Cristoforo Colombo, 1451-1506）是發現新大陸（美洲）的義大利航海家；立溫士頓（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是發現非洲維多利亞瀑布和馬拉威湖的英國探險家；克雷武（Robert Clive, 1725-1774）是征服印度與孟加拉的英國殖民者；維廉濱（William Penn, 1644-1718）是開拓北美殖民地的英國拓荒者。

〔……〕」[110]其中，李長傅更是沿用梁啟超的「殖民」概念作為其書名，該書目錄中幾乎所有篇章的標題皆有「殖民」二字。無怪乎王賡武在評價梁啟超對於華僑史的貢獻時指出：『〔……〕是梁啟超把「華僑」與「殖民」成功地聯繫起來〔……〕儘管這部著作充滿著基本的錯誤，大部分為後來的中文著作所糾正，但它卻為其後三十年年或四十年年的華僑歷史著作奠定了模式。』[111]因此，Ong Sum Ping 在汶萊稱王的傳說也自然成為他們重點敘述的對象，且盡可能地摻入自己的諸多推測與見解使之合理，以證明真有其人其事。

自上述兩人之後，談及 Ong Sum Ping 的華僑史學者越來越多，有田汝康的《沙撈越華人的早期歷史》（1953 年[112]）、羅香林的《婆羅洲與中國交通之史實》[113]（1961 年）、黃堯的《馬・星華人志》[114]（1967 年）、陳烈甫的《東南亞洲的華僑華人華裔》[115]（1979 年）、謝育德的《北婆羅洲沙巴百年簡史》[116]（1981 年）、陳育崧的《婆羅史支那王傳說之研究》[117]（1983 年）、林遠輝、張應龍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118]（1991 年）等等。大部分人還是根據溫雄飛的說法，將 Ong Sum Ping 中譯為「黃森屏」，但也有「黃昇平」、「黃升平」、「王三品」、「黃總兵」、「王總兵」等等。「三品」之名譯自「Sum Ping」，有些人認為「Sum Ping」並非其名，而是指其官階，因為他曾在元或明朝中「官居三品」，而「總

[110] 梁啟超：《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中國偉人傳五種》（台北：台灣中華書局），頁 54。

[111] 王賡武著，蔡壽康、陳大冰譯：《中國歷史著作中的東南亞華僑》，《南洋資料譯叢》（1982，No. 04），頁 7。

[112]《沙捞越华人的早期历史》一文是田汝康于一九五三年出版的英文著作 *The Chinese of Sarawak* 中的附录。该附录的中文译文收录于云南民族大学编的《民族学报》第四辑（2006 年）。

[113] 羅香林：《婆羅洲與中國交通之史實等》，羅香林主編：《香港大學歷史學會慶祝金禧年刊》（香港：香港大學歷史學會，1961 年，第二期），頁 1-6。

[114] 黃堯：《馬·星華人志》（香港：明鑒出版社，1967 年）。

[115] 陳烈甫：《東南亞洲的華僑華人華裔》（台北：正中書局，1979 年）。

[116] 謝育德：《北婆羅洲沙巴百年簡史》（沙巴：斗湖日報社，1981 年）。

[117] 陳育崧：《婆羅史支那王傳說之研究》，椰陰館文存編委會：《椰陰館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學會，1983 年），頁 25-29。

[118] 林遠輝、張應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

兵」則是他的官職，主要來源於溫雄飛友人發現「黃總兵之墓」的那段軼事。然而，他到底姓「黃」還是姓「王」？依舊沒有定論。其實，若根據閩南方言語音，「黃」的閩南聲調一般為「n̂g」、「hnuí」和「ʾnuí」[119]；「王」的聲調便是「óng」[120]。近當代新、馬一帶祖籍閩南的華人姓「黃」的一般拼音為「Ng」或「Ooi」，而「王」姓的拼音便是「Ong」。再者，Ong Sum Ping 在汶萊民間流傳的《阿旺・瑟瑪翁詩》裡名叫「Wang Sunting」、「Awang Sunting」或「Ong Sunting」，都跟「王」的語音有直接關聯，相較之下，「黃」的閩南語音與「Wang」或「Ong」的差距較大。此外，上文曾提及在宋濂的《勃尼國入貢記》一文裡，記載了國王馬合謨沙有個宰相名叫「王宗恕」，也許 Ong Sum Ping 與宰相王宗恕是親戚或有某種程度的關係。因此，我個人推測 Ong Sum Ping 姓「王」的可能性比「黃」大得多。

一九九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國與汶萊簽署中汶建交公報，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或許是為了給歷史性的「中汶建交」造勢，一些汶萊本地學者也開始對 Ong Sum Ping 的身世之謎產生興趣。如時任汶萊歷史研究中心主任的賈米爾（Jamil Al-Sufri）在其一九九〇年出版的有關汶萊早期歷史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中國史料，並引述了溫雄飛認為 Ong Sum Ping 於一三七五年來到汶萊王國的說法，又參考了《明史》中麻那惹加那乃一四〇八年死於中國時年僅二十八歲的記錄，認為兩者在年齡上相差太大，所以 Ong Sum Ping 不是《世系書》裡的第二任蘇丹阿末，也不是《明史》中的第二任國王麻那惹加那乃。[121]然而，令人納悶的是他在書中說了「Ong Sum Ping 被委任為京那巴當岸首領（Ketua Kinabatangan）」這句話，並加上註解表示這句話來源於《明史》第三二五卷[122]，但我卻不記得有任何明代史料裡曾經提到過「Ong Sum Ping」這個人或是「Kinabatangan」這個地方。一九九二年，他在《達魯薩蘭期刊》（*Jurnal Darussalam*）創刊號中發表

[119] 林寶卿編：《普通話閩南方言常用詞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24。

[120] 林寶卿編：《普通話閩南方言常用詞典》，頁 578。

[121] Jamil Al-Sufri, *"Tarsilah Brunei: Sejarah Awal dan Perkembangan Islam,"* pp. 49-50.

[122] Jamil Al-Sufri, *"Tarsilah Brunei: Sejarah Awal dan Perkembangan Islam,"* p. 21（注 2）.

的一篇梳理沙里夫・阿里的默罕穆德世系的文章中，也提及了 Ong Sum Ping 於洪武年間（Hung-wu，不晚於一三七五年）來到汶萊娶了蘇丹莫哈末的女兒拉娜・德維公主（Puteri Ratna Dewi），而其妹妹（adik）則嫁給了帕提・伯拜（Patih Berbai，Sultan Ahmad）並誕下一女，即帕提・伯拜之女與來到汶萊的阿拉伯人沙里夫・阿里成婚，並在日後繼位為蘇丹博卡。[123]二〇〇六年，他在同期刊發表名為《汶萊蘇丹來自中國?》的文章中再次強調蘇丹阿末是帕提・伯拜，並非 Ong Sum Ping。即便如此，Ong Sum Ping 在汶萊史上真有其人，因為在他皈依伊斯蘭後便與蘇丹莫哈末之女成婚，定居汶萊並被封為馬哈拉加・雷拉親王（Pengiran Maharaja lela）。[124]同時間，北京外國語大學馬來語專家吳宗玉也在同份期刊中發表《中汶友誼》（Persahabatan China-Brunei）一文，認為 Ong Sum Ping 是隨鄭和七下西洋的王景弘（Wang Jinghong）：「其中一支前往汶萊的分艕船隊即由王景弘統領，即「王總兵」（Wang Zhong Bing）。如今汶萊的 Jalan Ong Sum Ping 便是為了紀念 Ong Sum Ping 在汶萊。」[125]另一位汶萊學者拉蒂夫（H. I. Abdul Latif）則認為 Ong Sum Ping 的兒子（或另一個有中國血統的親戚）便是麻那惹加那乃，因為他有中國血統，所以他訪問中國的用意是想通過永樂皇帝的認可來鞏固他的統治。[126]此外，民間流傳的《阿旺・瑟瑪溫詩》裡甚至稱 Ong Sum Ping 原本就是中國皇帝的兒子[127]，因此也有當地學者認為嫁給蘇丹阿末的 Ong Sum Ping 之妹也是「中國皇帝的親戚」。其

123 Jamil Al-Sufri, "Sultan Sharif Ali", *Jurnal Darussalem*, 1992, Bilangan 1, pp. 6-7.

124 Jamil Al-Sufri, "Sultan Brunei Berasal Dari China?", *Jurnal Darussalem*, 2006, Bilangan 6, p. 10.

125 Wu Zongyu, "Persahabatan China-Brunei", *Jurnal Darussalem*, 2006, Bilangan 6, p. 16.

126 參見 Johannes L. Kurz, "Making history in Borneo: Ong Sum Ping and his others during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pp. 93。原文可見於 Haji Ibrahim A. L., "Theoretical linkages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Brunei*,"*in Putu Davies ed., *Constructing a national past: National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 Brunei, Indonesia, Thailand, Singapore,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Bandar Seri Begawan: Universiti Brunei Darussalam, 1996), pp. 154。

127《阿旺·瑟瑪溫詩》裡稱 Ong Sum Ping 和 Wang Kang（或 Ong Wangkang）原本都是中國皇帝的兒子，因尋找龍珠而來到中國巴魯山。他在取得龍珠後卻被 Wang Kang 要挾交出龍珠而回到汶萊，娶了蘇丹莫哈末之女，被封為「馬哈拉加·雷拉親王」（Pengiran Maharaja lela），其妹妹則嫁給了蘇丹莫哈末的弟弟，名叫帕提·伯拜（Patih Berbai），也就是第二任蘇丹阿末。

中，哈芝・登加（Ampuan Haji Tengah）在其二〇一五年有關「古代汶萊對外關係」的文章裡直接把《世系書》裡所謂的「中國國王的親戚」（saudara raja China）英譯為「中國皇帝的妹妹」（the Emperor of China's sister[128]），並為 Ong Sum Ping 的妹妹添加上「京那巴當岸公主」（Princess Kinabatangan[129]）的封號。

如今，汶萊官方與汶萊歷史研究中心認定 Ong Sum Ping 是中國皇帝的親戚（adinda kerabat Maharaja China），娶了第一任蘇丹莫哈末的女兒拉娜・德薇公主（Puteri Ratna Dewi），被封為馬哈拉加・雷拉親王（Pengiran Maharaja lela）。第二任蘇丹是《明史》中那位死於中國的麻那惹加那乃（或稱 Sultan Abdul Majid），第三任國王則是蘇丹莫哈末的弟弟蘇丹阿末，蘇丹阿末又娶了來自京那巴當岸 Ong Sum Ping 的妹妹，即京那巴當岸公主（Puteri Kinabatangan）。來自阿拉伯的先知後裔沙里夫・阿里又娶了蘇丹阿末擁有一半中國人血統的女兒，即拉娜・可素瑪公主（Puteri Ratna Kesuma）。[130]不得不說，在當代汶萊學者的「畫龍點睛」下，這段汶萊與中國的「和親歷史」基本建構完成。

中國大陸方面，雖沒有將這段被汶萊方建構出來的「和親歷史」照單全收，但仍「不失禮貌」地對這一系列能夠凸顯兩國友好的說法給予某種程度的認可。一九九二年七月，中國外長錢其琛應邀訪問汶萊，拜會汶萊蘇丹哈桑納爾・博爾基亞（Sultan Haji Hassanal Bolkiah），蘇丹談及兩國悠久的友好交往，曾表示汶萊首都有一條街道名為「Ong Sum Ping Road」，是兩國傳統友誼的象徵。據隨行者透露，當時在場的許多中國出

128 Ampuan Haji Tengah: "Silsilah raja-raja Brunei: The Brunei Sultanat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ountries," Ooi, K. G. ed., *Brunei: History, Islam, society and contemporary issues*,(London: Routledge, 2015), pp. 46, 51.

129 Ampuan Haji Tengah: "Silsilah raja-raja Brunei: The Brunei Sultanat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ountries," pp. 51.

130 Jabatan Perkembangan Kurikulum Kementerian Pendidikan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Sejarah Sultan-sultan Brunei*, pp. 4-6；文萊歷史研究中心（Pusat Sejarah Brunei）官方網站上也有「蘇丹世系表」可供下載（http://www.pusat-sejarah.gov.bn/Info%20Sejarah/INFO%20SEJARAH.aspx）。

席者們包括錢外長，始知「歷史」上有 Ong Sum Ping 這一號人物。[131]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中國駐汶萊大使楊健接受中國——東盟博覽會秘書處組織的採訪團採訪，以書面形式回答：「中國和汶萊的友好交往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到西漢時期。中國南京的渌泥王墓、汶萊斯里巴加灣市內的『王總兵路』（Jalan Ong Sum Ping）、蒲公墓碑等都是兩國歷史交往的有力見證。自一九九一年中汶正式建交以來，兩國關係發展非常順利，各領域交流與合作不斷提升。」[132]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往汶萊進行國事訪問前夕，在汶萊《婆羅洲公報》、《詩華日報》、《聯合日報》、《星洲日報》發表題為《攜手譜寫中國同汶萊關係新華章》的署名文章中，提及：「中汶兩國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鄰邦。汶萊自古便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中國西漢時期，我們的祖先就通過這條海上紐帶互通有無，譜寫了相知相交相親的美好篇章。鄭和率領船隊兩次途經汶萊，給當地人民帶來了和平與友誼，被汶萊民間親切稱作『鄭和元帥』。斯里巴加灣市的『王總兵路』和蒲公墓，中國南京市的渌泥國王墓，都見證了兩國悠久的友好交往歷史。」[133]可以看出，「Ong Sum Ping」這個名字在當代中國與汶萊交往的過程中，確實發揮了一些「歷史」作用。至於那位被汶萊學者與官方追封為「和親公主」的「巴當岸中國國王親戚」，則明顯不及其父親（或哥哥）Ong Sum Ping 那麼有名。

陸、民間心目中的 Ong Sum Ping

不僅許多中外學者對 Ong Sum Ping 深感興趣，當地民間和網際網路上

131 黃溪連：《不接觸就無法戀愛——中汶關係以及我與汶萊的情緣》，劉新生主編：《中國和汶萊的故事》（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7 年），頁 37。

132 左勝丹：《中國駐汶萊大使：中汶關係發展具備天時地利人和 經貿合作進入高速增長期》，《中國新聞網》，2017 年 5 月 10 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17/05-10/8220386.shtml。

13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攜手譜寫中國同汶萊關係新華章》，國務院公報 2018 年第 34 號，2018 年 11 月 17 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46488.htm。

也流傳與充斥著許多關於黃森屏的「小道消息」，有說他是元朝在婆羅洲置行省委任的總督；有說他本是一位不得志的元朝官員，奉命出使汶萊便從此留居當地；[134]有說他本是明朝官員，朱元璋派他前去汶萊尋找黃金，[135]也有說派他去找黃金的皇帝是朱棣；[136]有說「王總兵」就是跟著鄭和一起下西洋的副手王景弘，如今斯里巴加灣的「王總兵路」（Jalan Ong Sum Ping）的命名便是為了紀念王景弘；[137]有說他來到汶萊娶了蘇丹公主，成為宮廷大臣，或者他便是明史裡的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永樂時回到故土，死於中國，又或者他便是小國王遐旺的叔父，曾提議將浡泥國納入明朝的版圖；還有人說他便是《東西洋考》與《明史》中提到的萬歷時有閩人在婆羅洲為王者。[138]人們爬梳有限的史籍資料，發揮了無限的想像力，以至於 Ong Sum Ping 的身世傳聞眾多，真偽莫辨。

其中最令我感到詫異的是，在「百度百科」上有關「黃森屏」的生平介紹，竟然出奇的「詳盡」。該網站的「黃森屏」主詞條這麼說：「黃森屏（Ong Sum Ping，1339-1408 年），初名元壽，字昌年，號熙春。福建泉州鯉城區熙春鋪市曹巷竹西黃良輔長子。元末明初從軍，華人政權首領，汶萊國創始人之一。汶萊文寫作『ONG SUM PING』。中國福建泉郡市曹巷人，明洪武八年時，初任鶴慶守備。由於騰沖地理位置重要，明洪武帝朱元璋派黃森屏重兵駐守，並建造了石頭城，稱之為『極邊第一城』。因黃森屏英勇善戰，屢建奇功，后升為雲南永昌騰沖衛總兵。率領整個家族及鄰居數千人經西南部緬甸避亂航海南渡抵達婆羅洲〔……〕」[139]主詞條

[134] HDLXYNLKB：《汶萊國家之黃族宗親》，江夏黃族網，2016 年 4 月 8 日，http://www.jxhzw.org/hwhs/596.html。

[135] 和評：《朱元璋派此人去淘金，結果一去不回建個國家》，留園網，2019 年 10 月 31 日，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383907。

[136] 歷史揭秘檔案：《400 年前，中國一「叛徒」在海外建國，如今富到人人豔羨》，騰訊網，2020 年 10 月 29 日，https://xw.qq.com/partner/vivoscreen/20201029A0CG8800。

[137] 黃溪連：《不接觸就無法戀愛——中汶關係以及我與汶萊的情緣》，劉新生主編：《中國和汶萊的故事》，（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7 年，頁 37。

[138] 丘啟楓：《追溯汶萊歷史謎團，明代王總兵其人其事》，王崇喜主編：《「東盟文心·驃國詩情」第十六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文集》，（曼德勒：第十六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籌委會，2018 年），頁 349-352。

[139] 參見「百度百科」網站「黃森屏」詞條，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A3%AE%E5%B1%8F。

之下，還有「開發」、「融合」、「去世」、「事蹟」、「汶萊史跡與國王血統」五個子條目，不一一贅述。然而，據我所知，自羅歐一八八〇年發表的文章中提及 Ong Sum Ping，中外學者關注 Ong Sum Ping 已一個世紀有餘，但目前連其到底姓「黃」還是姓「王」尚且難以確定，何以「百度百科」能如此「神通廣大」，連其原名、字、號、生卒年歲、生父祖籍、生平事蹟、甚至來自哪個村、哪條巷皆巨細靡遺？上述「黃森屏」的生平介紹顯然「詳盡」得不合常理。

【圖三】「百度百科」中「黃森屏」詞條的介紹[140]

於是，我又以「黃元壽」作為關鍵詞在網路上搜尋，結果發現大部分有關「黃元壽」的網上資訊都與「福建金墩黃氏」有所關聯。比如在《江夏黃族網》一篇名《汶萊國開國國王黃森屏之名是明皇祖朱元璋御賜》的文章，大意為：據《安平金墩黃氏宗譜》與《明史》海絲人文史跡記載，晉江安平水心亭西金墩黃森屏蘇丹祠遺址，系雲南總兵汶萊開國元勛黃元壽的出生地。因其在中國南海森屏灘[141]抗倭有功，被朱元璋賜名「森

[140] 圖來源：「百度百科」網站「黃森屏」詞條，截圖日期為二○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文章發出前該詞條的內容已稍有修改，大意基本未變）。

[141]「森屏灘」是一九四七年後南中國海西沙群島永樂群島北部的一座小沙洲的名字。一九三五年，民國政府公佈該島名為「觀測灘」；過後，為紀念明初奉命出使婆羅的黃森屏，於一九四七年公佈其為「森屏灘」。中共政府於一九八三年則公佈該沙洲名稱為「銀

屏」，又奉使至浡泥國，成為汶萊的開國元勛與並肩王。為紀念其功，明永樂十五年丁酉歲秋，泉州知府方圓和鄭和三保將軍在五里橋東畔安平水心亭西倡建了晉江安平水心亭西金墩黃森屏蘇丹祠，明末後廢於兵火〔……〕[142]文中也附上兩篇文言文文獻，似是想證明上述所言非虛，文獻一為〈閩海青陽黃王府祀事碑志〉，無註明作者，全文皆四字一句，內容言及黃森屏的生平事蹟和蘇丹祠的建立荒廢；文獻二為《皇明文衡・卷八十一》：〈浡泥國並肩王森屏黃公神道碑〉，作者為胡廣，敘述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即並肩王黃森屏於永樂時葬在南京的始末。關於文獻一，我在另外一篇介紹「金墩黃氏祖祠」的網上文章裡找到一塊牌匾的照片，該塊牌匾中的內容便是〈閩海青陽黃王府祀事碑志〉一文，但該牌匾也無註明作者及寫作年代。除了一些照片外，該篇文章也提及黃森屏就是浡泥國並肩王，去世後葬在南京；黃森屏的妻子名李惠娘，去世後葬在長寧鎮國山，因此該山被當地番人稱為「中國寡婦山」；黃森屏之妹名黃元麗，嫁給蘇丹阿末，被賜予京那巴當岸公主的稱號，另一個段落又有說嫁給蘇丹阿末的是黃森屏之女黃桂姑；還有黃森屏兒子，即《明史》裡的小國王遐旺，原名黃克孫（汶萊名沙里夫・阿里），娶了阿拉伯麥加來的閨女為王后。[143]至於所謂的文獻二，的確是有《皇明文衡》一書，乃由明嘉靖時（1529 年）程敏政所編，查了《皇明文衡》卷八十一，開篇便是〈渤泥國恭順王墓碑〉[144]一文，作者也是胡廣，該文的確是敘述永樂時葬於南京的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的事蹟，但文中完全沒有提及「黃森屏」或是「並肩王」，再徹查全書目錄，根本就沒有一篇名為〈浡泥國並肩王森屏黃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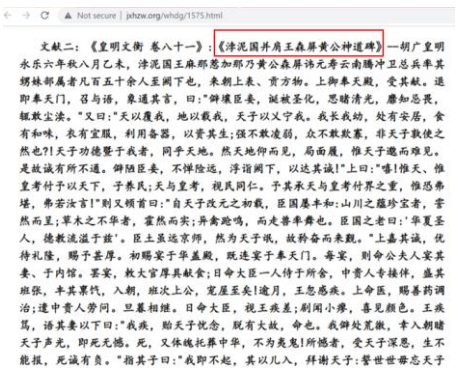
嶼」。可見「森屏灘」這個名字並不是早在明代時就有，應該是一九二九年溫雄飛將「Ong Sum Ping」譯為「黃森屏」之後，一九四七年官方才以「森屏」之名稱呼該沙洲，間接可以證明該文中所謂明初黃元壽在森屏灘立下戰功，被朱元璋賜名為「森屏」的說法完全是附會，也可說明「黃森屏為金墩黃氏祖先」的一系列說法多半編造於一九四七年以後。

142 福建晉江安平金墩黃森屏蘇丹祠文物修復委員會：《汶萊國開國國王黃森屏之名是明皇朱元璋御賜》，江夏黃族網，2019 年 4 月 17 日，http://www.jxhzw.org/whdg/1575.html。

143 江夏黃氏一家親：《福建莆田黃石金墩黃氏祖祠》，鳳凰新聞，2019 年 10 月 18 日，https://ishare.ifeng.com/c/s/7qsqKdAClw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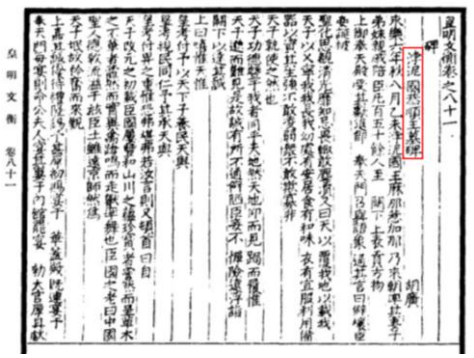
144〔明〕程敏政編：《皇明文衡》第四冊（影印自無錫孫氏小涤天藏明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年），頁 629-630。

神道碑〉的文章。因此，我認為這篇頗有古風文采的「文獻二」是修改自〈浡泥國恭順王墓碑〉一文並且假托古人的偽作。無獨有偶地，廈門大學的陳支平教授在二〇二一年時也發表過文章，專門揭露了黃氏中的一些族人偽造古籍篇章並且蒙騙陳教授，以其名義為黃森屏立碑的斑斑劣跡[145]。



文献二：《皇明文衡 卷八十一》：《浡泥国并肩王森屏黄公神道碑》一胡广皇明永乐六年秋八月乙未，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黄公森屏讳元寿云南腾冲卫总兵率其甥妹部属者凡百五十余人至阙下也，来朝上表、贡方物。上御奉天殿，受其献。退即奉天门，召与语，象通其言，曰："僻壤臣妾，诞被圣化，思睹清光，磨知忌畏，辄敢尘渎。"又曰："天以覆我，地以载我，天子以义宁我。我长我幼，处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备器，以资其生；强不敢凌弱，众不敢欺寡，非天子敦使之然也?!天子功德暨于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见，局而履，惟天子邈而难见。是故诚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惮险远，浮诣阙下，以达其诚!"上曰："嗟!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养民；天与皇考，视民同仁。予其承天与皇考付界之重，惟恐弗堪，弗若汝言!"则又顿首曰："自天子改元之初载，臣国屡丰和：山川之蕴珍宝者，蓄然而呈；草木之不华者，霍然而实；异禽跄鸣，而走兽率舞也。臣国之老曰：'华夏圣人，德教流溢于兹'。臣土虽远京师，然为天子氓，故矜奋而来觐。"上嘉其诚，优待礼隆，赐予甚厚。初赐宴于华盖殿，既连宴于奉天门。每宴，则命公夫人宴其妻、于内馆。罢宴，敕大官厚具献食；日命大臣一人侍于所舍，中贵人专接伴，盛其班张，丰其累饩，入朝，班次上公，宠屋至矣!逾月，王忽感疾。上命医，赐善药调治；遣中贵人劳问。旦暮相继。日命大臣，视王疾差；剧闻小瘳，喜见颜色。王疾笃，语其妻以下曰："我疾，贻天子忧念，脱有大故，命也。我僻处荒徼，幸入朝睹天子声光，即死无憾。死，又体魄托葬中华，不为夷鬼!所憾者，受天子深恩，生不能报，死诚有负。"指其子曰："我即不起，其以儿入，拜谢天子：誓世世毋忘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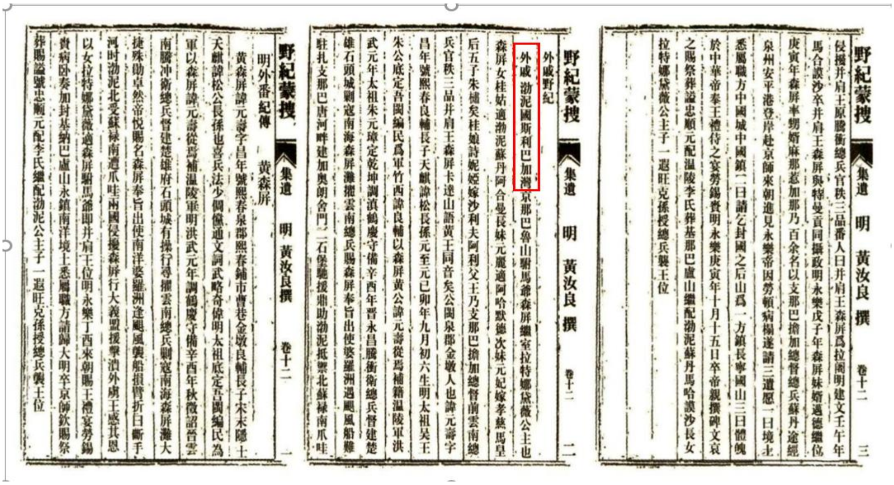
【圖四】《皇明文衡》卷八十一〈浡泥國並肩王森屏黃公神道碑〉（偽作）



皇明文衡　卷八十一

【圖五】《皇明文衡》卷八十一〈浡泥國恭順王墓碑〉（原作）

145 陳教授在其文中指出：二○一九年時，一位旅居海外的黃氏族人給陳教授寄來據說是明末文人黃汝良作的《野紀蒙搜》的其中三頁古籍複印件，該複印件內容正是有關黃森屏建功於域外，成為南洋渤泥國駙馬和國王的事蹟，並希望以陳教授的名義立碑讚言。因該三頁古籍複印件看起來相當逼真，而黃汝良的《野紀蒙搜》一書在大陸早已散佚，陳教授信以為真，便欣然同意其請求。之後，陳教授委託海外的朋友找到了《野紀蒙搜》的孤本，發現《野紀蒙搜》中根本沒有那三頁內容，才知道自己上當了。他當即聯繫該黃姓海外族人，不要把他的名字刻在碑文上。該黃氏族人回覆陳教授，說他們會推倒重做，會把陳教授的名字刪除。不久，該黃氏族人給陳教授發來重新鐫刻並把其名字刪除掉的碑文照片。為萬全起見，陳教授又委託友人到泉州樹碑處看看究竟換了沒有，那裡樹立的仍然是刻有陳教授的名字的碑文。至於那張新碑文的照片，經過陳教授一位精通電腦的學生仔細檢查，才發現他們只是把照片中陳教授的名字用電腦技術抹黑處理，企圖矇混過關。參見陳支平：《閩台家族文化炫耀的當代變異——以泉州黃氏家族為例》，《閩台文化研究》，2021 年第 1 期，頁 16-18。



野紀蒙搜 集遺 明 黃汝良撰 卷十二 一

明外番紀傳 黃森屏

黃森屏諱元壽字昌年號熙春泉郡熙春鋪市曹巷金墩良輔長子宋末隱士天麒諱松公長孫也喜兵法少倜儻通文詞武略奇偉明太祖底定吾閩編民為軍以森屏諱元壽從爲補溫陵軍明洪武元年調鶴慶守備辛酉年秋徵詔晉雲南騰冲衛總兵晉建楚雄府石頭城有操行尋擢雲南總兵剿寇南海森屏灘大捷殊勛卓然帝悅賜名森屏奉旨出使南洋婆羅洲逢颶風襲船損臂折臼斷手河时渤泥北受蘇祿南遭爪哇兩國侵擾森屏行大義盟援擊潰外虜王感其恩以女拉特娜黛薇適森屏駙馬爺即并肩王位明永樂丁酉來朝賜王禮宴勞錫賚病卧奏加封基納巴盧山永鎮南洋境土悉屬職方請歸大明卒京師欽賜祭葬賜謚號忠順元配李氏繼配渤泥公主子一遐旺克孫授總兵襲王位

野紀蒙搜 集遺 明 黃汝良撰 卷十二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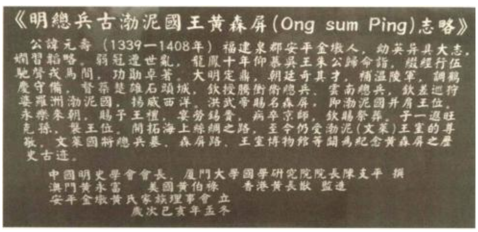
外戚野紀

外戚 渤泥國斯利巴加灣京那巴魯山駙馬爺森屏繼室拉特娜黛薇公主也森屏女桂姑適渤泥蘇丹阿合曼長妹元麗適阿哈默德次妹元妃嫁孝慈馬皇后五子朱橚矣桂娘詩妮婭嫁沙利夫阿利父王乃支那巴擔加總督前雲南總兵官秩三品并肩王森屏卡達山語黃王同音矣公閩泉郡金墩人也諱元壽字昌年號熙春良輔長子天麒諱松長孫元至元己卯年九月初六生明太祖吳王朱公底定吾閩編民爲軍竹西諱良輔以森屏黃公諱元壽從爲補籍溫陵軍洪武元年太祖朱元璋定乾坤調滇鶴慶守備辛酉年晉永昌騰衛衛總兵晉建楚雄石頭城剿寇南海森屏灘擢雲南總兵賜森屏奉旨出使婆羅洲遇颶風船難駐扎支那巴唐河畔建加奥朗舍門二石堡馳援鼎助渤泥抵禦北蘇祿南爪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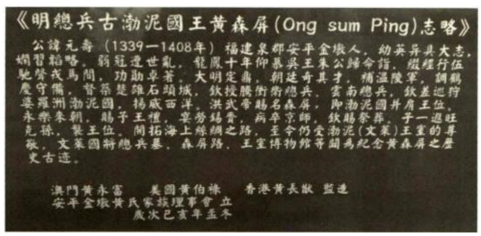
野紀蒙搜 集遺 明 黃汝良撰 卷十二 三

侵擾并肩王原騰衛總兵官秩三品番人曰并肩王森屏爲拉閣明建文壬午年馬合謨沙卒并肩王森屏與特曼貢同攝政明永樂戊子年森屏妹婿邁德繼位庚寅年森屏率甥婿麻那惹加那乃百余名以支那巴擔加總督總兵蘇丹途經泉州安平港登岸赴京師來朝進見永樂帝因勞頓病榻遂請三遺愿一曰境土悉屬職方中國城中國鎮二曰請乞封國之后山爲一方鎮長寧國山三曰體魄於中華帝奉王禮待之宴勞錫賚明永樂庚寅年十月十五日卒帝親撰碑文哀之賜祭葬謚忠順元配溫陵李氏葬基那巴盧山繼配渤泥蘇丹馬哈謨沙長女拉特娜黛薇公主子一遐旺克孫授總兵襲王位

【圖六】《野紀蒙搜》「明外番紀傳」和「外戚野紀」中有關黃森屏的內容，經陳教授查證《野紀蒙搜》孤本後證實此二篇乃偽作。其實，從開篇第一句出現「斯利巴加灣」[146]這個一九七〇年後才有的地名便可輕易判斷其乃後人杜撰。[147]



【圖七】〈明總兵古渤泥國王黃森屏〉碑文（刻有陳教授名字的真實版本）[148]



【圖八】〈明總兵古渤泥國王黃森屏〉碑文（陳教授名字被電腦抹黑處理後的假照片）[149]

---

[146] 汶萊王國早期的首都是石頭城（Kota Batu），《世系書》載由 Ong Sum Ping 帶來的華人與其女婿第三任蘇丹沙里夫·阿里合力營建；而「斯里巴加灣」這個名字，是在一九七○年以後才改的。若該文獻真的作於明末，文中出現的汶萊首都就應該是「石頭城」而不是一九七○年後才改的「斯里巴加灣」。

[147] 圖來源：摘自陳支平：《閩台家族文化炫耀的當代變異——以泉州黃氏家族為例》，《閩台文化研究》，（2021 年第 1 期），頁 17。

[148] 圖來源：同上。

如前所述，「黃森屏」是溫雄飛根據《世系書》裡的 Ong Sum Ping 音譯出來的名字，溫雄飛音譯該名時並無特別考究，所以其他學者如李長傅（黃昇平）、黃堯（王三品、黃昇平）等均對其有不同的譯名。根據一五九〇年手稿與現存最早的《世系書》所述，可以推測汶萊歷史上應該真有蘇丹曾經娶過中國女子；根據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成書的《B 手稿》與《卡瑪魯丁手稿》等敘述，可以推測或許曾經有中國移民首領娶過蘇丹的公主，這個娶了蘇丹公主的中國移民首領可能叫做 Ong Sum Ping；根據羅歐的說法，可以聯想到 Ong Sum Ping 可能就是中國巴當岸王，其妹妹或女兒嫁給了汶萊蘇丹。上述說法、猜測與聯想尚算有理有據，儘管 Ong Sum Ping 這個中國名字是後來加上去的，目前也沒有直接證據可證明 Ong Sum Ping 就是中國巴當岸王。然而，若說 Ong Sum Ping 便是姓「黃」名「森屏」，這個說法肯定漏洞百出。

除了附錄文獻二確定是改編自《皇明文衡》裡《淳泥國恭順王墓碑》的偽作外，文中也提及黃元壽被朱元璋賜名「森屏」，因其在南海森屏灘抗倭有功，然而，這明明是「先有『黃森屏』（1929 年溫雄飛創造），後有「森屏灘」（1947 年民國政府命名）」的問題，不可能早在明朝初年該灘便叫「森屏灘」。此外，也說晉江安平水心亭西金墩黃森屏蘇丹祠乃由鄭和三保大人倡建，硬要將其與鄭和扯上關係也很明顯是一種附會，最後又說該蘇丹祠明末毀於兵火，所以基本上是「死無對證」了，儘管其所謂的後人可能已在該地隨便圈出幾段「斷石殘壁」說成是「故蘇丹祠遺址」，甚至已在所謂的遺址旁邊「重建」了一座新的蘇丹祠。只能說，一些有心人為了把這位傳說中在汶萊當過國王的 Ong Sum Ping 納入族譜，以光耀家族門楣，可謂費盡心思、耗費人力物力，甚至無所不用其極。

[149] 圖來源：摘自陳支平：《閩台家族文化炫耀的當代變異——以泉州黃氏家族為例》，《閩台文化研究》（2021 年第 1 期），頁 18。

柒、結語

【圖九】汶萊詩里亞市的「中國公主路」與斯里巴加灣的「Ong Sum Ping 路」照片（丘啟楓攝）[150]

如今，汶萊首都斯里巴加灣的「Ong Sum Ping 路」，是汶萊境內唯一一條以華人名字命名的道路，關於此路名來歷的民間傳說就有好幾個版本。[151]而詩里亞市（Seria）也有一條中國公主路（Jalan Puteri China），究竟這條路的「中國公主」是 Ong Sum Ping 的妹妹還是女兒，不得而知。[152]至於溫雄飛書中所說的其同鄉友人黃氏曾在汶萊發現的一座「黃總兵之

150 圖來源：截圖自丘啟楓：《追溯汶萊歷史謎團，明代王總兵其人其事》，《亞洲週刊》特稿（2018 年第 34 期），官網網址：https://www.yzz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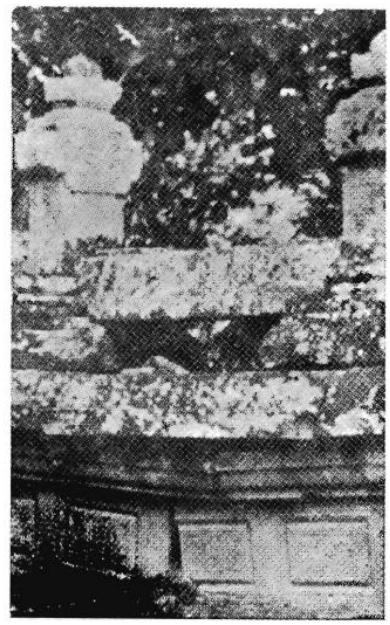
151 曾在中國駐汶萊大使館工作（1993-1997 年，2007-2008 年）的黃溪連在當地就聽過好幾個故事版本，其中一則比較有趣的故事版本：Ong Sum Ping 成為蘇丹的駙馬後，有一天蘇丹過生日，Ong Sum Ping 為表達孝敬之意，命僕人宰雞。在馬來語中，「宰雞」（bunuh ayam）與「殺父」（bunuh ayah）的發音極為相似。僕人誤以為 Ong Sum Ping 要殺死蘇丹，立即向蘇丹匯報。蘇丹大怒，處死了 Ong Sum Ping。後來真相大白，蘇丹為表達懊悔和紀念，便以 Ong Sum Ping 命名首都的一條繁華街道。參見黃溪連：《不接觸就無法戀愛——中汶關係以及我與汶萊的情緣》，頁 37-38。

152 丘啟楓：《追溯汶萊歷史謎團，明代王總兵其人其事》，頁 349。

墓」墓碑，此後的中外學者即便汶萊當地學者僅引述其說法，至今沒有學者敢聲稱曾經親眼見過該墓碑。不過，黃堯的《馬・星華人志》裡曾有一張模糊不清的照片插圖，圖下註明是「黃昇平之墓」[153]，但我實在看不出該墓碑上哪裡有「中國大字」，並且觀其墓碑的形制，更像是一座伊斯蘭墓碑。此外，據說一九八六年時汶萊歷史研究中心曾派學者在汶萊甘榜・亞逸等地區收集過一些當地人的口述資料，有當地人提及他曾見過 Ong Sum Ping 的墓碑，該墓碑本來坐落於石頭城遺址靠近蘇丹卜基亞（Sultan Bohkiah）墳墓處，但後來被當地員警下令挖掘移走，此後無人知曉該墓碑的去處，[154]所以又是「死無對證」了。然而，我仍然有些懷疑那些聲稱看過 Ong Sum Ping 墓碑的當地人，如何曉得那座「已漫漶不可讀」的墓碑就是「黃總兵之墓」？是否真的看得懂「中國大字」？

[153] 黃堯：《馬·星華人志》（吉隆坡：元生基金會、馬來西亞黃氏總會，2007 年），頁 261（1967 年初版，香港明鑒出版社）。

[154] Abdul Karim Bin Haji Abdul Rahman, *Sejarah Pengasasan dan Asal Usul Kerajaan Brunei Berdasarkan Sumber Lisan*, pp. 246.



（。墓之平昇黃）

Batu）馬。』從這段所記中，可以看到王三品先是娶了第一世蘇丹的女兒，後來，又把自己的女兒，嫁給第三世蘇丹的，所以說：即有蘇丹的女兒嫁給他，他也有女兒嫁給蘇丹，這兩項均為事實，不過，他在北婆羅洲王室中作贅壻，並且做了王，這是華人在婆羅洲的一點特色。

王三品的來到北婆羅洲，是在元代的至元廿九年，即公元一二九二年，因元世祖出兵遠征各處，曾以北婆羅洲設立為一個行省，並且兼轄蘇祿東島，當時派的總督，官職也可能是「總兵」，名叫 Ong Sum-ping，音譯為黃昇平，或 Wang Sum-ping，音譯為王三品。如「黃總兵」的古墓確屬是他的，而姓是 Ong，那麼，他姓「黃」無疑。

至於蘇祿東島，是很靠近北婆羅洲的，依照華文古籍中所記，它是一海國，有時與渤泥交好，有時有戰事。在費信跟鄭和下南洋時，所摸的星槎勝覽中，亦有記到蘇祿國：『居東海之洋，石崎保障，山塗田瘠，種植稀薄，民下捕魚蝦生啖，螺蛤煮食，男女斷髮，頭纏皂縵，腰圍水印花布，俗尚鄙陋，煮海為鹽，釀蔗為酒，織竹布，採真珠，色白絕品，珠有徑寸者，已值七八百錠，中者二三百錠。永樂十六年，其酋長感慕聖恩，乃挈妻拐子涉海來朝，進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罕古莫能有也。皇上大悅

【圖十】黃堯《馬・星華人志》中所謂的「黃昇平之墓」插圖[155]

汶萊版中國公主的故事以及 Ong Sum Ping 的傳說，恰好是東南亞一帶流傳的一些中國公主故事的一個典型案例。這些看似不怎麼真實的和親故事，往往在流傳與演變的歷史過程中，不同時代、不同背景、不同立場的人們，皆會賦予該故事不盡相同的存在價值和意義，最後被建構為當地歷史的一部分。

十六世紀的汶萊當地人向他加祿商人敘述他們的蘇丹曾經得到中國皇帝的冊封與娶過中國（巴當岸）國王親戚的事蹟，可能只是在與外國人的閒聊過程中一次不經意地對本國歷史和王室的吹捧炫耀；呂宋島的他加祿商人附會編造出汶萊蘇丹前往中國並娶了中國國王親戚的故事，可能只是想向西班牙殖民者交代該國蘇丹統治婆羅洲的歷史依據；《世系書》敘述者與作者在其手稿中加入來自中國祖先的傳說，可能只是想說明早期蘇丹

[155] 圖來源：截圖自黃堯：《馬·星華人志》，第 261 頁。

譜系裡的確有中國人的血統；早期華僑史學者在祖國經歷多事之秋的年代盡可能地在其史著中提起 Ong Sum Ping、梁道明、林道乾、羅芳伯等中國人在南洋地區「殖民」的傳說與事蹟，可能只是想讓當時四萬萬同胞們重新尋回民族的自信心；當代汶萊史學者以「公主」來稱呼嫁給蘇丹阿末的 Ong Sum Ping 之妹並宣稱他們都是中國皇帝的親戚，可能只是想借用這段稱不上歷史的和親傳說來凸顯過去以及當代汶萊與中國的良好關係；汶萊當地華人對 Ong Sum Ping 的身世與事蹟津津樂道，可能只是想表明華人移民汶萊歷史悠久並在汶萊開國與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曾作出了貢獻；黃氏後人把或許不是姓「黃」的 Ong Sum Ping 納入黃家祖宗譜系，應該只是想為黃氏家門多添一份「曾有祖先在海外當過國王」的殊榮。

Ong Sum Ping 與中國巴當岸公主究竟是史實還是傳說？歷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其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當代汶萊社會上至蘇丹王室，下至平民百姓，皆對 Ong Sum Ping 推崇備至，認為其在汶萊蘇丹王國建國時期曾作出了巨大貢獻，並且比較願意相信早期汶萊蘇丹曾經娶過一位中國皇帝親戚之女，汶萊王室擁有中國明朝皇室的血統。無論在過往（中國明朝與浡泥王國），還是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汶萊達魯薩蘭），汶萊與中國、土著與當地華人始終維持著良好的關係。很明顯地，這些傳說如今被賦予的存在價值和當代意義，已遠遠大於其歷史真實與否。

引用書目

古代文獻

〔唐〕姚思廉
1995 《梁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唐〕魏征等
2005 《隋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後晉〕劉昫等
1995 《舊唐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宋〕趙汝适
1937 《諸蕃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

〔宋〕歐陽修等
2005 《新唐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元〕汪大淵著，蘇繼廎校釋
1981 《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元〕脫脫等
1995 《宋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明〕宋濂
1937 《勃尼國入貢記》，《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

〔明〕張燮
1985 《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明〕程敏政編
19--? 《皇明文衡》第四冊（影印自無錫孫氏小涤天藏明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年）。

〔明〕費信著，馮承鈞校注
1936 《星槎勝覽校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年）。

〔清〕張廷玉等
1996 《明史》（長沙：岳麓書局，1996 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1962 《明實錄·明太祖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1962 《明實錄·明太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1962 《明實錄·明宣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

CARROLL, John S.
1982 "Berunai In The Boxer Codex,"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55, No. 2 (243) (1982), pp. 1-25.

GALLOP, Annabel Teh
2018 "Silsilah Raja-raja Brunei: The Manuscript of Pengiran Kesuma Muhammad Hasyim," *Archipel 95*, Paris, 2018, pp. 173-212.

LOW, Hugh
1880 "Selesilah (Book of the Decent) of the raja Bruni," *Journal of the strait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 5(June 1880), pp. 1-35.

SWEENEY, P. L. Amin
1968 "Silsilah Raja-raja Berunai,"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 41, No. 2 (214) (1968) , pp. 1-82.

SHARIFFUDDIN, P. M. & IBRAHIM, Abd. Latif Hj.
1974 "Batu Tarsilah': The Genealogical Tablet of the Sultans of Brunei,"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7, No. 1 (225) (1974), pp. 87-95.

近人文獻

王賡武著，蔡壽康、陳大冰譯 Authored by WANG Gungwu, translated by CAI Shoukang & CHEN Dabing
1982 《中國歷史著作中的東南亞華僑》，《南洋資料譯叢》（1982，No. 04），頁 1-14。
"Southeast Asian Huaqiao in Chinese History-Writing,"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 Quarterly Journal of Translations* (1982, No. 04) , pp. 1-14.

田汝康 TIEN Ju-kang
2006 《沙撈越華人的早期歷史》，雲南民族大學編：《民族學報》第四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頁 109-118。
"An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arawak," in Yunnan Minzu University(ed.), *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4th

Series(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2006), pp. 109-118

丘啟楓 CHIEW Chee Phoong

2018 《追溯汶萊歷史謎團，明代王總兵其人其事》，王崇喜主編：《「東盟文心·驃國詩情」第十六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文集》（曼德勒：第十六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籌委會，2018 年），頁 347-353。

"Tracing the mysteries of Brunei history: the life and deeds of General Wang of the Ming Dynasty," in Wang Chongxi(ed.), *ASEAN Literary Mind and Pyu Poetry - Collection of the 16th ASE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Camp* (Mandalay: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16th ASEAN Chinese Cultural and Art Camp, 2018), pp. 347-353.

安東尼·瑞德著，孫來臣、李塔娜、吳小安譯 Authored by REID Anthony, translated by SUN Laichen & LI Tana & WU Xiaoan

2017 《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ume 2,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李長傅 LEE Chang-foo

1937 《中國殖民史》（上海：上海書店，1937 年）。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lonization, (Shanghai: Shanghai Book Publishing House, 1937).

林遠輝、張應龍 LIN Yuan Hui & Zhang Yinglong

1991 《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Guangzhou: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1991)

林寶卿編 LIN Baoqing(ed.)

2007 《普通話閩南方言常用詞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 年）。

Commonly used dictionary of Mandarin and Minnan dialect,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07).

陳烈甫 CHEN Liefu

1979 《東南亞洲的華僑華人華裔》（台北：正中書局，1979 年）。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ese descendants in Southeast Asia, (Taipei: Cheng Chung Book Co., Ltd., 1979).

陳育崧 TAN Yeok Seong

1983 《婆羅史支那王傳說之研究》，椰陰館文存編委會：《椰陰館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學會，1983 年），頁 25-29。
A Study of the Legend of the Chinese King of Borneo, in Yeyin Library Editorial Committee, *Document Preservation of Yeyin Library*, Vol. 1, (Singapore: The South Seas Society, 1983), pp-25-29.

陳支平 CHEN Zhiping
2021 《閩台家族文化炫耀的當代變異——以泉州黃氏家族為例》，《閩台文化研究》（2021 年第 1 期），頁 12-21。
"The Contemporary Variation of the Show off of Family Culture in Fujian and Taiwan--Taking the Huang Family in Quanzhou as an Example," *Fujian-Taiwan Cultural Research*, (2021, vol. 1), pp. 12-21.

黃堯 HUANG Yao
2007 《馬·星華人志》（吉隆坡：元生基金會、馬來西亞黃氏總會，2007 年）。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Yuan Sheng Foundation, Malaysia Huang Clan Federation, 2007).

黃溪連 HUANG Xilian
2017 《不接觸就無法戀愛——中汶關係以及我與汶萊的情緣》，劉新生主編：《中國和汶萊的故事》（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7 年），頁 35-44。
No contact, no love—China-Brunei relations and my connection with Brunei, in Liu Xinsheng(ed.), *The story of China and Brunei*, (Beijing: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17), pp.35-44.

郭宗華 KOH Chong Wah
2016 《「傳說」如何被建構為「歷史」——以「中國公主漢麗寶」的故事為例》（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
How "Legend" Was Being Constructed to "History"：A Case Study of "Chinese Princess Hang Li Po's" 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2016)

郭宗華 KOH Chong Wah
2022 《東南亞的「中國公主」傳說研究》（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2 年）。
The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Princesses" Legends in Southeast Asia, (Xiame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2022)

溫雄飛 WEN Xiongfei

1929 《南洋華僑通史》（上海：上海東方印書館，1929 年）。
General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hanghai: Shanghai Oriental Press, 1929)

鍾敬文 ZHONG Jingwen
1981 《民間文藝談藪》（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Talk,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1)

謝育德 XIE Yude
1981 《北婆羅洲沙巴百年簡史》（沙巴：斗湖日報社，1981 年）。
A Brief History of Sabah, North Borneo, (Sabah: Daily Bulletin Sabah, 1981)

聶德寧、張元 NIE dening, ZHANG Yuan
2018 《牽星過洋——福建與東南亞》（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 年）。
Pulling Stars Across the Ocean: Fujian and Southeast Asia,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18)

羅香林 LUO Xianglin
1961 《婆羅洲與中國交通之史實等》，羅香林主編：《香港大學歷史學會慶祝金禧年刊》（香港：香港大學歷史學會，1961 年，第二期），頁 1-6。
Historical facts about transportation between Borneo and China, etc., in Luo Xianglin(ed.),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History Society's Golden Jubilee Yearbook*, Hongkong: The History Societ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1, vol. 2, pp. 1-6.

GOULD, S. B. & BAMPFYLDE, C. A.
1909 *A history of Sarawak under its two White Rajahs 1839–1908* (London: Henry Sotheran, 1909), pp. 36–37.

HUGHES-HALLETT, H. R.
1940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Brunei," *Journal of the strait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8, No. 2 (1940), pp. 23-42.

Jabatan Perkembangan Kurikulum Kementerian Pendidikan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2015 *Sejarah Sultan-sultan Brunei*, (Bandar Seri Begawan: Syarikat Pencetakan Juta Jaya, 2015).
The History of Sultans of Brunei, (Bandar Seri Begawan: Juta Jaya Printing Company, 2015).

JAMIL, Al-Sufri
1990 *Tarsilah Brunei: Sejarah Awal dan Perkembangan Islam*, (Bandar

Seri Begawan: Jabatan Pusat Sejarah, 1990).
The Tablet of Brunei: Early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Islam, (Bandar Seri Begaw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Centre, 1990).

1992 "Sultan Sharif Ali," *Jurnal Darussalem*(1992, Bilangan 1), pp. 6-33.

"Sultan Sharif Ali," *The Darussalem Journal* (1992, no. 1), pp. 6-33.

2006 "Sultan Brunei Berasal Dari China?," *Jurnal Darussalem*(2006, Bilangan 6), pp. 6-11.

"The Sultan of Brunei Is From China?," *The Darussal Journal* (2006, no. 6), pp. 6-11.

Kurz, Johannes L.

2018 "Making history in Borneo: Ong Sum Ping and his others during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Vol. 14(2), 2018, pp. 79-104.

RAHMAN, Haji Abdul Karim Bin Haji Abdul

2016 *Sejarah Pengasasan dan Asal Usul Kerajaan Brunei Berdasarkan Sumber Lisan*, (Falkutal Sastera dan Sains Sosial Universiti Malaya, 2016).
The History of the Founding and Origin of the Brunei Government Based on Oral Sourc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2016).

REID, Anthony

2010 *Imperial Alchem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SAUNDERS, Graham.

1994 *A History of Brunei*,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TENGAH, Ampuan Haji

2015 "Silsilah raja-raja Brunei: The Brunei Sultanat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Ooi, K. G.(ed.), *Brunei: History, Islam, society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 45-61.

WU Zongyu

2006 "Persahabatan China-Brunei," *Jurnal Darussalem*, (2006, Bilangan 6), pp. 12-22.
"China-Brunei friendship," *The Darussalem Journal*, (2006, no. 6), pp. 12-22